

本期导读

本刊编辑部

2013年9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提出“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当天下午,在中哈两国元首的共同见证下,连云港市与哈萨克斯坦国有铁路股份公司共同签署中哈过境运输中转分拨基地合作协议。协议的签定,标志着以连云港为东端起点的新亚欧大陆桥国际物流大通道得到进一步加强。面对这一宝贵的历史机遇,几年来,连云港迅速行动,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了更广范围、更大意义上的东中西区域大合作局面。详见市委改革办副主任刘成文撰写的《筑梦东方:连云港打造“一带一路”最便捷出海口》。

1933年,海属地区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5月,东海县百余名共产党员被捕,7月,东海特委书记曹苏被捕,特委领导机关解体,海属地区党组织瘫痪,革命陷入低潮。党组织被破坏后,失去关系的党员虽然得不到组织的领导,但他们时刻关注党中央的声音,他们渴望党的领导。为此,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开始了寻找党组织的艰辛历程。在寻找党组织的早期党员中,邰华民同志就是其中的代表。在那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邰华民同志上哪找的党组织,是如何找到党组织的,跟他一起找党组织的还有谁?请看李晗撰写的《抗战烽火燃激情 奔赴千里把党寻——记东海县早期党员邰华民寻党往事》。

唐开成四年(公元839年)三月二十九日,日本和尚圆仁乘船到达海州管内东海县东海山东边,入澳停住,开始了他的入唐求法巡礼的海州之

行。在接下来的9年里,圆仁先后3次到海州,前后共计30天。他在入唐求法巡礼期间,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日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为今天的中日韩及世界各国研究“一带一路”的专家学者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唐时的东海县县治在哪?圆仁是如何上岸的,走的哪条路线,如何参见官府人员的……请参阅我市地方文史研究者闫祥富撰写的《圆仁入海州路详解》。

淮盐历史悠久,成形于汉初,唐宋步入稳定发展期,元代跃上一个高度,明清则达到鼎盛。因其量大,要销往朝廷指定的销区,外运一直是十分重要的事。在当年生产力水平局限下,淮盐外运一向以水路运输为主。连云港淮盐文化研究会的胡可明同志,就古海州地出产的淮盐从水路外运的信史及学术著作中,遍拾珍珠串而成的文章《淮盐与古海州水运》,讴歌了盐河及与盐河纵横交错的众多的小型河流,另加海运对淮盐的运销所作的重要贡献。

莒国,己姓,或云嬴姓、曹姓。据《世本》载:“己姓出自少昊”。莒当是东方夷人少昊后裔所建立的国家。莒族兴起于羲、农之世,立国于三代,而始见经《春秋》、传《左传》。周武王灭商以后,又封兹舆期于莒,大概是对降服于周的莒国进行重封以表示承认其合法地位。莒国初都于介根,或称计斤。西周初年,莒部落作为西周降服的小国,仍都计斤,春秋初年徙都于莒城,即今莒县驻地一带地域。计斤在哪?现在叫什么名称?请参阅孙铭同志的文章《莒国初都计斤城》。





《连云港史志》编委会

顾问：(以姓氏笔画排列)

古龙高 刘畅征
许燕鑫 杨春生
李洪甫 张良群
张学贤 张树庄
张建民 彭云
韩世泳

主任：苏中保

副主任：张斌 赵廷旗
陆瑞萍 魏鹏

委员：(以姓氏笔画排列)

王一平 王淙
王滨 白植明
刘鹏 邱仕明
张再楼 张辉
胡卫星 姜龙才
郝芳 戚盼德
韩翠林

主编：苏中保

副主编：张斌 赵廷旗
陆瑞萍 魏鹏

责任编辑：邱仕明 张伟敏

于冰清

文字总校：张骏鹏

目

喜迎十九大建设新港城专栏

04 筑梦东方：连云港打造“一带一路”最便捷出海口

/ 刘成文

峥嵘岁月

10 抗战烽火燃激情 奔赴千里把党寻

——记东海县早期党员郇华民寻党往事

/ 李 晗

史志论坛

13 为灌南脉动而歌

——《灌南年鉴》创刊 20 周年随想

/ 韩翠林

地方文化研究

15 圆仁入海州路详解

/ 闫祥富图 / 文

19 淮盐与古海州水运

/ 胡可明

23 连云港历史沿革史话(十二)

/ 刘凤桂

26 黄窝碑刻

/ 胡可才

国学讲义

29 先民心声 质朴情怀

——先秦古诗五首

/ 鱼 禾



录

郁洲溯源

- 32 莒国初都计斤城 / 孙 铭
35 连云港市境内的望海楼 / 蔡立志
38 海州二营巷的得名 / 宋继奎

人物剪影

- 36 诗人杨廷镇 / 刘洪雨

风物览胜

- 41 话说海州饼 / 韩世泳
43 青口老街 / 葛永明
47 见证沧海桑田的龙洞庵
——九庵十八庙之三 / 孙大伟

封二:史志掠影

封三:古韵海州 诗赋名山

纵览历史借古鉴今
展现风貌追溯渊源
立足港城洞开窗口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地 址:连云港市海州区朝阳东路 69 号
邮 编:222006
网 址:www.lygsz.gov.cn
电子邮箱:Lygshitan@163.com
电 话:(0518)85825137 85821368
印 刷:连云港市百草园教育印刷有限公司
准印证号:苏新出准印 JS—G033 号
出版日期:2017 年 6 月

2017 年第 3 期总第 111 期
(内部资料 赠阅交流)



筑梦东方：连云港打造『一带一路』最便捷出海口



2014年5月19日，“一带一路”首个实体平台——中哈国际物流基地正式启用

刘成文

“丝绸之路”，象征着开放、文明和进步。连云港是古代著名的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的连接、交汇点，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2013年9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题为《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提出要“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当天下午，在中哈两国元首的共同见证下，连云港市与哈萨克斯坦国有铁路股份公司共同签署中哈过境运输中转分拨基地合作协议。协议的签订，标志着以连云港为东端起点的亚欧大陆桥国际物流大通道得到进一步加强，在“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层面，连云港又一次得到了世界的瞩目。面对这一宝贵的历史机遇，连云港迅速行动，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了更广范围、更大意义上的东中西区域大合作局面。

一、重大机遇：连云港在融入“一带一路”战略中的独特优势

“一带一路”的宏伟战略构想提出以后，国内各地积极行动，一时间掀起了抢占概念先机的高潮，如西安提出了争当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排头兵，甘肃提出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段、新疆提出当好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桥头堡、主力军。连

云港作为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和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是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各地通往太平洋最便捷的出海口岸,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中起着海陆交通大枢纽、大通道的独特作用。这一点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诸方面,都得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充分肯定。

(一)连云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东方门户。连云港,因海有连岛、山称云台而得名,雄踞祖国万里海疆中部,东与日韩隔海相望,西依新亚欧大陆桥经济带连通中亚、西亚直至欧洲。连云港具有悠久的航海历史,早在公元前 2 世纪,秦始皇曾东巡到此,并立石建“秦东门”,以这里作为秦帝国的东大门。方士徐福从这里经朝鲜半岛到达日本,开创了中、韩、日三国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成为日本古代文明的开拓者。位于连云港的孔望山佛教摩崖造像已经被举世公认为比中国最早的佛教石窟——敦煌莫高窟还早 300 年,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认为这是佛教从海上东传的确凿证据。

(二)连云港是中国重要的对外开放口岸。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连云港都是繁荣的商港、海陆交汇的要冲。早在唐代,连云港就设立了最早的外事机构——海州高丽亭馆,在云台山麓的宿城乡还保存着新罗人曾居住的“新罗村遗址”。1919 年,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其著名的《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中,计划在中国海岸建设 31 个港口,按其重要程度,连云港列第 5 位。1984 年 4 月,国家决定将连云港列为首批 14 个对外开放城市之一。1994 年 3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 21 世纪议程》,同时制定了中国 21 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该计划提出,将连云港市建设成为连接太平洋沿岸国家与中亚地区的国际性港口城市、环境优美的旅游中心、国际商贸中心与交通枢纽。

(三)连云港港是中国中西部最便捷出海口。连云港位于中国万里海疆的中部,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被国家确立为主枢纽港。中西部到连云港,铁路运距比到青岛近 500 公里,比到日照近 300 公里,

比到上海近 480 公里,连云港 60% 的进出口货物是由中西部地区提供的。新亚欧大陆桥从 1992 年开通运营以来,连云港承担了整个陆桥 90% 以上的国际过境运输量。

(四)连云港是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1992 年 12 月 1 日,首列过境列车从连云港发出,实现了新亚欧大陆桥国际联运“零”的突破。作为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连云港具有连接南北、沟通东西的独特区位,向东与日、韩隔海相望,海上距离不足 500 海里;向西通过全长 10870 公里的国际大通道新亚欧大陆桥,将太平洋沿岸国家地区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地区紧密联系起来,是陇海兰新沿线地区乃至中亚国家的重要出海通道。

(五)连云港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2014 年 12 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规划》(中发〔2014〕14 号),明确连云港为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首个节点城市,支持建设中哈(连云港)物流中转基地和上海合作组织出海基地(又称“两基地”)。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六大经济走廊中,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基础最好、潜力最大,连云港作为东端起点,具备辐射中西部地区和中亚国家的影响力;在“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确定的海上战略支点方面,连云港作为东部沿海的重要港口、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北翼,已经与 160 多个国家建立航运经贸合作关系,并通过陆桥运输大通道成功串联起海陆丝绸之路。2015 年 3 月,全国“十三五”规划纲要再次明确提出在连云港建设上合组织国际物流园和中哈物流合作基地。2015 年 5 月,江苏省委、省政府将连云港确定为全省推进“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的核心区和战略先导区。

二、使命担当:连云港在融入“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主动作为

正是由于连云港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独特战略地位,党和国家赋予重要的战略使命。2009 年 4 月 20 日,习近平同志在连云港视察时说:“如果孙悟空的故事有现实版的写照,就是连云港在新的时



期、新的世纪后发先至,构建新欧亚大陆桥,完成新时代的西游记。”2010年8月22日,李克强同志在连云港视察时指出:“连云港位置连中启西,是我国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形成良性互动的战略支点,特别是具有辐射中原腹地独特的港口优势和发展优势。”2009年6月,国务院审议通过以连云港为重点的《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2011年5月,国务院批复在连云港设立东中西部区域合作示范区,这是国家设立的首个横跨东、中、西三大区域合作的示范区,是进一步加强区域合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又一重大战略决策。

(一)建设中哈物流中转基地。哈萨克斯坦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中亚地区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和互联互通的“主开关”,中哈物流合作由此成为连云港港口对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与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共同见证了连云港市与哈国铁签订共建中哈物流基地项目的合作协议。2014年5月,中哈两国元首又在上海通过视频连线方式见证了中哈(连云港)物流基地项目一期启用。2015年8月,中哈两国元首在北京见证江苏省政府与哈国铁签署中哈项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推动中哈合作提档升级。12月,习近平主席在杭州会见哈萨克斯坦马西莫夫总理时指出,中方将支持中哈(连云港)国际物流合作基地以及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建设,积极参与哈萨克斯坦国内交通基础设施项目。2015年12月,中哈两国总理在北京签署《中哈政府联合公报》,双方将共同努力确保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稳定、高效运营,共同打造陆海联运便捷通道。2017年6月8日,正在哈萨克斯坦访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共同出席中哈亚欧跨境运输视频连线仪式并致辞。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希望中哈双方继续通力协作,将连云港——霍尔果斯串联起的新亚欧陆海联运通道打造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标杆和示范项目,共同建设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

(二)建设上海合作组织出海基地(上合组织国

际物流园)。2013年11月,李克强总理在出席上合组织第12次总理峰会期间,提出“中国愿在新亚欧大陆桥东端的连云港,为成员国提供物流、仓储服务”。2015年12月,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第十四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提出上合组织重点打造六大合作平台,其中在加快建设互联互通合作平台中明确在连云港建设国际物流园。按照这个构想,连云港市规划了45平方公里的上合组织(连云港)国际物流园,重点打造包括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以及与上合国家有重要经贸往来的国家或地区的物流商贸平台。已建成货物堆存场地146万平米,形成450万吨堆存能力,成功获批省级示范物流园,正积极申报国家级示范物流园和省级海洋经济创新示范园区。

(三)建设国家东中西部区域合作示范区。连云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盐业重镇,淮北盐场的重要产区大都位于连云港沿海境内。明代以善于理财而知名的监察御史庞尚鹏在奏折中写道:“两淮煮海为盐,岁课甲天下,九边之供亦实赖之。”在整个明代,大体上,两淮盐课占全国盐课收入的一半左右。根据明万历八年(1580)的一个统计,全国的盐课收入为129万两白银,而两淮独占60万两,占到50%左右。清代《两淮盐法志》称:“盐商夙号殷富,而两淮尤甲天下。”早在清代,徐圩盐场就是淮盐的五大盐场之一。进入新世纪,传统制盐业已经走到了“死胡同”,大量的低产盐田几于荒废。2006年初,江苏开始启动沿海开发战略研究,提出举全省之力发展连云港,4月,省委、省政府着眼连云港发展需要,将江苏金桥盐化集团的万顷盐田下拨地方管理。2009年6月,国务院批准实施《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在此背景下,连云港市委常委会作出了加快港口发展全力推进徐圩盐场开发建设的重大决策。2011年5月31日,国务院批复在连云港市设立国家东中西部区域合作示范区,明确位于徐圩盐场的徐圩新区作为示范区的先导区,要求将示范区打造成为服务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东中西产业合作示范基地、区域合作体制机制创新试验区。徐圩新区规划面积约467平方公里,属于



徐圩新区管理的土地资源约 175 平方公里,其中,建设用地面积约 153 平方公里(低产盐田),规划建设为石化产业园(62.6 平方公里)、精品钢产业园(25 平方公里)、节能环保科技园(24 平方公里)、物流产业园(17.5 平方公里)和配套功能区,产业用地占建设用地面积的 80%左右(已出让和开发建设用地约 75 平方公里)。

(四)建设连云港跨境电子商务新城。连云新城位于连云港市北侧,东依北固山,西接临洪河口湿地,南临 242 省道,北拥海洲湾,总面积约 58.8 平方公里。连云新城是连云港市承载国家战略、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的重要载体,开发建设连云新城是完善连云港市大港口、大城市、大产业功能,加快推动港、产、城融合发展,快速展现滨海城市形象的重要举措。新城依山傍海,湖岛环抱,湿地绕城,汇聚了江苏沿海独具魅力的自然资源。连云新城是连云港市国际性海港中心城市建设主阵地、江苏沿海开发的主战场,承载着港城人民的蓝色梦想。2006 年开始,连云港市启动了连云新城的建设,开始大规模填海,2012 年 1 月成立开发建设指挥部,全面掀起了开发建设热潮。按照市委、市政府“一年打基础、两年见成效、三年主要功能区基本配套”的目标要求,一期开发建设 8 平方公里商务中心区,重点打造商务办公、休闲娱乐、滨水居住三大功能板块,将新城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环境优美、功能复合、集约高效的高端化商务中心区。二期规划到 2020 年,加快完善行政、商务、金融、文化、会展、居住、休闲、娱乐、旅游等功能,将新城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海港中心城市的核心区和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的特色功能区。2015 年 4 月,全面开工建设大陆桥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2016 年 1 月 1 日,基本建成投入使用。园区一期工程占地 600 多亩,共有 24 幢建筑,总建筑面积达 16 万平方米。整个园区道路通畅、设施齐全,是一个服务周到、功能完备的现代产业园。与连云新城一起,将打造成为集跨境电子商务、保税仓库、智能物流、快递通关、金融支付为一体的跨境电子商务产业生态链。

三、曙光初现:连云港在融入“一带一路”战略

中的阶段性成效

2013 年以来,连云港市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通”——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格局。先后确立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年”,出台了《“一带一路”交汇点核心区建设实施意见》《“两基地”建设发展实施意见》,着力构建港产城联动发展新格局,拓展东西双向开放新空间,全市综合发展实力明显提升。

(一)以港口为核心,建设综合交通枢纽。连云港深化港口经营管理体制改革,整合组建港口控股集团,积极提升主体港区、拓展两翼,强化对岸线、海域、土地的统一规划管理,科学设置港区功能定位和货种结构,港口发展形成了握指成拳、集中发力的良好态势。2017 年 5 月 22 日,江苏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成立。这是交通运输部和江苏省委、省政府推进全省沿江沿海港口资源整合和一体化改革的重大举措。连云港港是省港口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他国有港口分别为:南京、苏州、南通、镇江、常州、泰州、扬州等 7 家港口集团。省港口集团的资产总额 987 亿元,全集团集装箱吞吐量 1235 万标箱,占全省 76.7%,列全国第七位,货物吞吐量 6.94 亿吨,占全省 36.9%,居全国第二位。2017 年,连云港港的 30 万吨级航道一期工程建成通航,港口水深达—20 米,可以停靠世界最大的 40 万吨级超大型船舶,二期工程前期工作加快推进,30 万吨级矿石码头等建成投用,两翼赣榆、灌河、徐圩港区先后开港,组合大港格局基本形成,全港综合通过能力较 2009 年翻一番。先后开通 60 多条远近洋航线,2015 年完成吞吐量 2.1 亿吨、集装箱 501 万标箱。公路方面已建成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构建了“五横四纵”干线公路网络,海滨大道建成通车。连盐、连淮扬镇、连青铁路开工建设,徐连客专列入中铁总公司 2017 年开工计划。新机场选址获得国家民航局批复同意。疏港航道、盐河航道建成通航,实现千吨级船舶直通京杭大运河。

(二)以铁路为纽带,新亚欧大陆桥运输业务保持良好运营态势。1992 年,新亚欧大陆桥第一列国



际集装箱列车从连云港发出,并逐步形成了“一港双线”过境通道新格局,国内海铁联运、国际过境运输年度最高分别达到 30.3 万标箱和 10.6 万标箱,长期位列中国沿海港口第一。据统计,连云港承担了中国 50%以上、中亚国家 60%以上的大陆桥过境运输业务。2015 年 2 月 25 日正式开行的“连新亚”国际班列(连云港—阿拉木图),最快用时仅 6.5 天,已形成平均每周 5.3 列规模常态化运行,截至 2017 年累计完成 255 列、2.55 万标箱,运行时间、效率和效益在业内居首。2016 年 11 月 29 日,连云港成功将中亚班列延伸至欧洲,开行由连云港—哈萨克斯坦—里海—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土耳其的“连新欧”国际班列,这条全新的多式联运通道得到里海委员会成员国及土耳其的大力支持,新通道打破了原有北线单一的运作通道,战略意义重大。2016 年 3 月,伊朗高级代表团访问连云港,专题就推动连云港至波斯湾地区的国际运输洽谈合作。2016 年 12 月 13 日,在哈萨克斯坦总理马西莫夫和江苏省省长石泰峰共同见证下,又开行了连云港—哈萨克斯坦—德国的国际班列,并逐步实现了“连新欧”班列每月 2 列运行规模。截至 2017 年上半年,连云港大陆桥国际班列已经覆盖中亚五国、欧洲及沿线主要站点,实现了与阿拉木图、塔什干、伊斯坦布尔、杜伊斯堡等点对点的对接,形成了更大区域的互联互通。

(三)以“两基地”为平台,实现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共赢。加快建设“两基地”(中哈(连云港)物流中转基地和上海合作组织出海基地)是贯彻落实国家战略,畅通新亚欧大陆桥国际运输大通道的重要平台。中哈物流中转基地是“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首个实体物流平台,自 2014 年 7 月正式运营至今,基地一期累计完成货运量 269 万吨,集装箱进出 24.7 万标箱,集装箱拆装箱 5.7 万标箱;二期正按计划推进散粮筒仓、保税仓工程、大宗散货交易中心和铁路装卸场站、“霍尔果斯—东门”经济特区无水港等项目的互投合作。2016 年 2 月,国家质检总局又指定连云港口岸为哈萨克斯坦粮食过境中

国的唯一离境口岸,连云港市正会同哈方启动小麦过境中转、车用锂电池危险品班列运输及冷链物流等业务,提升中哈合作经营绩效,做强连云港国际班列品牌。45 平方公里的上合组织(连云港)国际物流园,是包括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以及与上合国家有重要经贸往来的国家或地区的物流商贸平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驻华使节、企业界代表多次考察上合物流园,已有哈萨克斯坦、立陶宛、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参与合作或接洽。同时扎实推进新疆霍尔果斯、哈萨克斯坦安腾科里 2 个配套场站合作,已形成“一园三区”链式布局。2016 年 5 月 3 日,土库曼斯坦驻华大使鲁斯塔莫娃率团访问连云港,实地考察上合物流园,推动了土库曼斯坦与连云港市的物流经贸合作。

(四)以口岸改革为突破口,不断拓展对内对外开放新空间。在连接海上丝绸之路方面,连云港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图巴朗港,新加坡 PSA 国际港务等知名航运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在上海自贸区注册成立云港海运公司,串联起以连云港为基地的“海上丝路航运网”,为上合组织国家货物提供更优化海运路线。在沟通“长江经济带”方面,连云港市在省委、省政府大力支持下,加快发展海河联运业务,依托通榆河、盐河等内河航道开通了至淮安、扬州并连接长江的内河航运业务,并正在规划“一港四线”内河运输网络,进一步打通苏北、豫东、皖北地区“借港出海”大通道。在口岸通关便利化方面,连云港口岸是交通部确定的中韩陆海联运试点口岸,国家质检总局确定的重要粮食进出口口岸和澳洲肉牛屠宰加工口岸。在全省率先启动了“三互”(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三个一”(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口岸便利化改革试点,获批设立全省首家多式联运海关监管中心,组织实施了启运港退税政策,建成了保税商品交易展示中心,区域通关一体化实现了与陆桥沿线海关和长江经济带海关的无缝衔接,新亚欧大陆桥检验检疫合作机制和苏北五市“直通放行”模式走在全国



前列,船舶“单一窗口”建设国内领先。成功举办两届连博会,搭建起丝绸之路国际经贸合作平台,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产生积极影响。

(五)以产业发展为支撑,“两基型”临港产业项目取得突破。基础性、基地型临港大工业加快发展,5000万吨级的炼化一体化项目获得国家核准并开展前期工作,珠江钢管、盛虹石化等一批投资过百亿的重大项目相继落户,石化、冶金等主导产业年产值突破千亿,国家级石化产业基地和炼化一体化项目获批开展前期工作。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生命健康、核电装备等特色产业园建设有序推进,“三新”和装备制造产业保持20%左右的年增长,医药创新能力全国领先。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突破2000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39%。以港口运输为主的现代物流业快速发展,产业规模超过700亿元。市级以上开发园区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市比重均超60%,其中南北共建园区2015年实现业务总收入520.6亿元,工业增加值100.9亿元,成为全市产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六)以城市建设为依托,国际化海港中心城市建设取得较大提升。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加快建设国际化海港中心城市,努力增强发展承载力。全面建立城乡规划体系,科学划分主体功能区。按照港产城融合发展的思路,积极推进集聚发展、紧凑建设,“两轴一环三圈”的城市框架结构基本确立。顺利完成市区区划调整,市区建成区面积拓展至204平方公里,组团递进、向心聚拢的发展格局全面形成。持续推进重点板块开发,科教集聚区形成规模,经过四年来的集中开发建设,连云新城商务中心区主干道路成网成片,基础设施基本建成,功能配套逐步完善,城市形象日益提升。总长44公里的23条道路、27座桥闸按照“三化”标准全面建成,海滨大道贯穿全境;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的海州湾会议中心、12万平方米的西墅湾美食文化水岸、7.2万平方米的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占地8万平方米的商务公园和新城学校、

社区服务中心已建成使用,44万平方米的商务租赁式办公和医院等配套设施正在建设。当前,新亚欧大陆桥安全走廊国际执法合作论坛永久会址、省级健康产业园、海洋文化旅游综合体等项目正在洽谈推进。新建的商务中心区有几大形象特色,一是面临海三面环水,呈岛状,内湾为片区核心景观,形成环绕新城的滨水绿带空间;二是两轴贯穿,蓝轴绿轴十字相映,东西向以水系形成蓝轴,南北向绿廊形成绿轴,强化空间序列。三是空间有序,地标节点互映,区域内超高层建筑形成地标统领整个空间,同时各区域内又有相应的高层建筑作为节点形成中间高、四周向海边和内湾低的“穹”顶形空间系统,形成商务中心区优美的城市天际轮廓线。据悉,连云区正积极推动上合组织秘书处,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办事处入驻办公。此外,“一关两检”等口岸单位进驻工作也在推进之中,在此基础上,航运“一站式”服务中心、船代货代物流企业入驻办公,区域性航运服务中心也将呼之欲出。在新城内,规划建设了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打造“电子商务+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的大宗商品与散杂货交易中心。鼓励吸引知名企业总部及其功能性、分支性机构入驻,加快打造区域性企业总部集聚区。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炼化一体化等重大项目落户连云港,连云新城的区位优势、资源条件和现实支撑快速凸显,土地将快速升温变热,新城人气将加快集聚,海内外客商纷至沓来,一个“生态、科技、现代”的魅力智岛、海上CBD将逐步展现在世人面前。

今天,当你漫步连云港岸边,辽阔的黄海,春潮拍岸;快速崛起的连云新城,生机盎然;全长125.8公里的海滨大道风光,彰显港城山海风光……连云港,这片山海相拥的土地,风景如画、海风劲吹,这里正以全新的姿态在“一带一路”的伟大战略蓝图中前行,在黄海激越雄壮的涛声中崛起!

(作者系中共连云港市委改革办专职副主任)

责任编辑 邱仕明



抗战烽火燃激情 奔赴千里把党寻

——记东海县早期党员郇华民寻党往事

李 吟



抗战初期赴西安找党的李铁民、郇华民、李立沼、郇振中(从左至右)合影。拍摄时间:1981年

1933年,国民党采取“防制和争取并重”的自首政策,使海属地区党组织遭受了严重的破坏。5月,东海县百余名共产党员被捕。7月,东海特委书记曹苏、委员孔照明被捕,特委领导机关从此解体,海属地区党组织瘫痪,革命陷入低潮。

党组织被破坏后,失去关系的党员虽然得不到组织的领导,但他们时刻关注党中央的声音。1936年8月,“东海抗日义勇团”成立,这是一个由郇圩

小学青年教师和进步学生组成的青年抗日团体。周晓江为团长,郇华民、李铁民等人为领导成员,团部设在郇圩小学。这为海属地区中共党组织的重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秉承信仰 奔赴西安去寻党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义勇团”意识到面对日军的入侵必须要做更扎实更细致的工作才行。郇华民根据在上海的斗争经验提出:“抗日救亡工作必须要取得党的领导,否则我们要迷失方向。”大家顿觉豁然开朗,一致同意他的意见。可是这里又出来一个新的问题:党在哪儿呢?要找党,当然最好到陕北去,因为党中央在陕北。可是陕北,一则路途实在太遥远,不是那么容易去;二则就是去了,能管一个小地方的事吗?

“上西安找党去!”郇华民突然想到,最近报上看到八路军在西安设办事处的消息。他把这信息告诉大家。大家仔细研究后一致决定,立即派人上西安找党。第一批派李铁民与郇霏,1937年12月上旬动身。大约十来天后,李铁民从西安来信。信中讲述了党的关系虽还没找着,但看到西安的抗日气氛非常好,肯定有党的领导。只要耐心寻找,一定能找到。这样,“义勇团”又派出郇华民、李立沼、郇振中、田素英共4人第二批赴西安找党。

在那个交通不发达的年代,又赶上战争,找党

的旅程是十分坎坷的,这段经历,邹华民在回忆录中有所记载:数九寒冬,为了躲避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他们一行四人趁天黑爬上了西行的闷罐车,中途车辆卸货,他们不得不下车,几经辗转终于找到一辆运木材的敞篷车。在露天的货车上,夜晚的风比刀子还锋利,再加上旅途奔波,饥肠辘辘,几个小时下来,四个人的身体都像失去了知觉。

好不容易到了西安后,邹华民一行和李铁民、邹霏很快汇合到一起,直奔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介绍,他们于1938年元旦过后,进入在泾阳县安吴堡举办的“西北战时青年训练班”学习。

“西北战时训练班”中,汇聚了中国共产党内许多知名的学者和经验丰富的军事专家,如胡乔木、冯文彬、刘瑞龙等都在训练班内任职任教,办得相当严谨有矩。邹华民、李铁民他们参加的“青训班”,是在安吴堡办的第一期、但总序数是第四期的“青训班”。“青训班”的课程设政治课和军事课两大类。通过学习,学员们除在军事知识与军事技能方面得到实际提高外,主要是思想上得到明显的提高,使他们进一步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进一步了解当前的形势,从而坚定他们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心。

毁家纾难 资助“武装”闹革命

“青训班”中的学员大部分是二十来岁的小青年,像已过而立之年的邹华民,在“青训班”中很少。但在上政治课时邹华民不仅专心听讲、踊跃发言,常常在讨论中发表比较深刻的见解而得到老师的赞扬。紧张学习了一个多月,第四期“青训班”于1938年2月17日举行了结业典礼。按邹华民他们想法,结业后奔赴延安投身抗日事业。然而“青训班”的领导对他们的去向有着明确的安排。

结业那天夜晚,“青训班”领导刘瑞龙把邹华民和李铁民二人请到他宿舍,代表组织与他们进行正式谈话。肯定他们此次西行并参加这次训练班的进

步和学习期间的优异表现,同意邹霏和邹振中二人去延安参加八路军。至于对邹华民和李铁民几人,组织上建议回家乡发动群众抗日,准备进行武装斗争。刘瑞龙曾在1929年作为省委巡视员,两次到过东海邹圩,与邹华民互相熟悉。刘瑞龙分别向邹华民、李铁民交代了几处可接上党的关系的地点与办法,要他们迅速回去,接上组织关系,在党的领导下,把东海地区的抗日斗争开展起来。

第二天,邹华民与邹霏、邹振中两个后辈依依惜别,和李铁民几人日夜兼程赶回徐州。到徐州后,正赶上日寇对徐州大轰炸。徐州城里到处是硝烟与烈火。趁着轰炸间隙,邹华民和李铁民二人谨慎地寻到刘瑞龙给的联络地点,可是那里已是一片瓦砾和灰烬。他们又到第二个接头地点,那儿虽然没有被炸,但组织已经转移。他们寻找不到接关系的地址,只得先回东海。

邹华民和李铁民回来后,决定按照刘瑞龙的指示精神办事,明确当前的工作方向为一明一暗两个方面:明的方面,继续扩大抗日宣传,进一步发展抗日力量,并更紧密地组织起来;暗的方面,积极搜集枪支弹药,为创建抗日武装做好思想和物质的各项准备工作。

1938年5月19日,徐州沦陷,东陇海一带危在旦夕。周晓江、邹华民与以孟宪禹为首的工作团商定,要扩大到全县去,把“义勇团”改名为更有号召力的“青年救国团”,组织演出,发动全民抗日。

“青救团”成立大会召开的时间定在8月16日,地点在房山东边的林疃村。参加会议总数近二百人,代表全县800多名团员。

大会选举了“青救团”领导成员。领导成员共9人,他们是:周晓江(团长)、邹华民(组织)、李铁民(宣传)、刘锡九(秘书)、徐润斋、孙秉衡、王子成、周镜涵、尹子才。总团部设在邹圩小学,下设24个分团,登记入团的正式团员有800多人,不到两个月就超过1000人。邹华民是“青救团”九常委中负责组织的常委,联络、指导下面24个分团是他的分内工作。



自从安吴堡回来后，邹华民领悟了父亲教诲的“博施济众”的临终遗言，也更明白了人世间的做人道理，视钱财为身外的工具，对抗日的事业更加慷慨。家中的钱库就是“青救团”的财务部，后勤用的开支，如纸张、油墨、油印机等物资钱财上的事，全由他一人当家。当时“青救团”经费很少，几个乡镇开明士绅的捐款也非常有限，大部分开支都是邹华民个人贴上。

锲而不舍 山东寻党得凯旋

1938年秋的一天，“青救团”几位负责人周晓江、邹华民、李铁民等人 and “总动委”联络员孟宪禹在邹华民家西南炮楼，一起研究工作。孟宪禹这半年多来与东海这些优秀青年在一起共同奋斗，肝胆相照，结下了深厚友谊。当时周晓江、邹华民谈到寻找党组织的迫切心情，还想派人出去找党。孟宪禹告诉他们自己是共产党员，不过这次到东海并无发展组织的任务，更没有发展组织的权力，但他提供了到山东郯城、码头一带可以找到党组织的信息，并表示他可以陪同一块去。大家听了欣然同意。

秋高气爽的一天，周晓江、邹华民、孟宪禹三人着农民打扮，来到山东郯城。到了县城更是一派抵御日寇的热烈气氛，看得邹华民一行心里热呼呼的。可是孟宪禹的战友已经调离郯城回部队，其他同志孟宪禹也不认识，在寻找党的关系上仍无进展。

这次邹华民三人到郯城找党，虽然还没有找着，但是他们受到了一次巨大鼓舞，看到了自己的努力方向，更坚定了必须发展抗日武装的坚定决心。

1938年10月，李铁民根据周晓江指示，送周朝鏊、刘凤锦、张继武、李铮等人去郯城庄坞青救训练班学习。在庄坞遇到应若冰。应若冰是1930年前后海州的地下党员，这时他正在八路军一家报刊任编辑。李铁民立即要求应若冰介绍几个人去岸堤抗大分校学习，应当即应允。1938年11月，李铁民

送周朝鏊等人进山东沂水岸堤抗大分校学习。学习期间，周朝鏊、刘凤锦等6人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结业后，刘凤锦等人留了下来，参加了山东地区的革命工作；周朝鏊于当年12月，受组织委派回家乡东海县开展工作。山东找党工作总算有了结果。

周朝鏊回来时，铁路南的海属地区东灌沐中心县委已经建立。周朝鏊到中心县委报到后，于1939年3月，在中心县委组织部长陈飞陪同下，回西乡重建党组织。那天夜晚，在竹墩村“青救分团”团部的槽坊房内，召开了建党会议。陈飞、周朝鏊找来了李铁民、刘锡九、周晓江、邹华民四人参加会议。

陈飞代表中心县委宣布东海西乡第一个党支部正式建立。接着就召开西乡第一个党支部支部会议。陈飞代表上级组织与会指导，邹华民和周晓江代表“青救团”列席支部会议。第一次支部会议上，选举了周朝鏊为支部书记，刘锡九为组织委员，李铁民为宣传委员，重点研究了下一阶段的工作，从此后，海州西乡地区的抗日救国斗争，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得到更加蓬勃的发展。

海属地区人民寻找党组织，充分反映了海属地区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衷心拥护和对革命理想的执着追求，是具有时代特色和地区特色的活动。他们深切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斗争的中流砥柱，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抗日救亡的许多重大问题就拿不定主意，把握不住航向，心里缺少主心骨。所以，他们在外出找党过程中，克服许多艰难险阻，忍饥受冻，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一次不成，二次再去，从不气馁，矢志不渝。他们自觉地把个人的命运、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对共产党的无限信赖、无限忠诚，就成为海属地区人民战胜敌人、克服困难的强大精神武器，成为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强大动力。

（作者单位：市革命纪念馆）

责任编辑 张伟敏



为灌南脉动而歌

——《灌南年鉴》创刊 20 周年随想

韩翠林

1997 年,《灌南年鉴》正式创刊。20 年来,《灌南年鉴》编纂质量逐年提高,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在省市年鉴界、全县各阶层中享有良好声誉。20 部《灌南年鉴》以 1900 多万字的体量,忠实记录了全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发展脉络。抚今思昔,我们既为《灌南年鉴》的承载功能而喝彩,更为灌南经济社会的脉动而歌唱,因为我们从编纂中得到了许多有益的启迪和收获。

一、共谱创新之曲,忠实记载灌南发展的辉煌历程

灌南的发展需要年鉴,年鉴也必须根植于灌南大地,这样的年鉴才会为各级领导、社会各界提供信息密集、准确权威、全面实用的地情信息,也会为人们认识灌南、研究灌南、建设灌南服务。

1、保存了灌南发展的全面资料

打开每本《灌南年鉴》,密集的信息会扑面而来,从县乡机关的工作规划到各行各业的发展实践,都是年鉴记载的主要内容。每本年鉴前后连贯、纵不断线,形成了一组组反映灌南发展变化的系列数据库,很好地再现了上一年度全县经济社会的发展脉络,刻录了时代发展印记,为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历史智慧与经验借鉴。

2、突出了灌南地情的年度特征

《灌南年鉴》在客观反映地情的前提下,把上年度最具特色的新成就、新情况、新事物载入其中。20 年来,《灌南年鉴》密切关注并突出反映具有年度标志性的重大事项,并以大量资料、数据、图表全面记载灌南经济社会所发生的历史性、跨越性变革,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为灌南历史留下了清晰的年

轮。

3、彰显了灌南县域的地方特色

灌南是传统农业大县,灌河通江达海,农村劳动力丰富,产业发达,人文丰厚,并荣膺全国食用菌工厂化生产第一县等诸多荣誉。《灌南年鉴》紧扣地情和发展实际,除设置常规的传统内容外,还先后开辟“灌河开发”“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食用菌产业”等特色栏目,从各个层面立体反映灌南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和特点。如 2012 卷《灌南年鉴》收录了 2011 年 4 月《文物》杂志登载的《江苏灌南刘氏墓志与吴承恩的祖居地》一文,用史实论证了吴承恩祖籍在灌南的观点,为二郎神历史文化研究增添了有力的佐证。

4、赓续了灌南人民的精神品格

绵延 2000 多年的海西文化,造就了灌南人民勤劳勇敢、聪明善良、爱国爱家、追求文明进步的精神品格。20 部《灌南年鉴》全面展示灌南当代社会发展中涌现出的各类风流人物,共收录了几百个人物简介、上千个人物名录,以及诸多的彩页人物等,其中国家和省市县各级党政军界领导,以及灌南籍名人和先进模范、专家学者和革命英烈等,在年鉴中矗立起一座反映灌南人民精神的群雕塑像。

二、齐奏编纂之拍,逐步形成灌南年鉴的自身特色

紧扣“单位必有、领导必备、资政必存、工商必览、创业必读”的办刊宗旨,我们不断改进方法,尽力把年鉴办成精品,是 20 年来《灌南年鉴》编纂工作始终追求的目标。

1、集思广益办好年鉴



一是在每年编纂《灌南年鉴》时都要经过几上几下,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使每年年鉴的新构想都能切合实际且能够行得通;二是随时和供稿单位及出版社保持联系,将编辑中的问题互相沟通以贯彻编辑意图;三是发挥社会上年鉴工作热心人和地方文史专家的作用,让他们帮助审读稿件。

2、多措并举加工条目

条目是年鉴内容的基本单元和主要表现形式。为此,我们坚持多措并举,提高文稿二度加工水平。一是在筛选年度大事的基础上确定条目选题,做到大事不漏、小事不收;二是对鉴载的数字逐一与县情概览、其他相关条目、统计表格等进行核对,避免差错;三是对不符合入鉴标准的总结式内容、没有实用价值的条目内容等进行调整或削减。

3、条分缕析避免重复

由于年鉴来稿内容存在较多的交叉重复,弄不好会使年鉴内容膨胀、水分增多,还会出现同一数据、事件内容记述出现差异,从而影响年鉴的准确性。我们把处理年鉴文稿的交叉重复作为编辑工作的重要内容,抓住制定框架、编辑校对、编制目录和索引等环节,每年处理交叉重复多达几十处,且通过详略互见、各有侧重等方法进行妥善处理,使年鉴记述内容繁而不乱,条理更加明晰。

4、精益求精提高质量

在每年年鉴文稿送交出版社审查的同时,我们都会制订专门的活动方案,规定具体要求,明确奖惩办法,组织人力开展年鉴文稿内容、标点使用及政治观点等无限多的校对和纠错活动。每次活动,从主编到编辑人员一直是朝乾夕惕,满负荷、快节奏地工作,对校对和纠错工作保持“高压”态势,总是不厌其烦,以期尽量消除“硬伤”、减少“遗憾”,从而有效提高年鉴的出版质量。

三、合唱有为之歌,成功体现存史资政的使用价值

《灌南年鉴》作为大型综合性资料工具书,其使用价值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和重视。20年前人们对《灌南年鉴》知之较少;现在人们对《灌南年鉴》已充满兴趣,并在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中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1、《灌南年鉴》已成为各级领导的案头用书

为了解灌南县情,一般新任县领导刚到灌南,往往就指名调阅全套《灌南年鉴》,他们在翻阅历年《灌南年鉴》时,往往能从中获得珍贵的信息资料,从而理清决策思路和发展方向。一些外地企业决策层也会在查阅《灌南年鉴》后,做出在灌南投资兴业的决策。

2、《灌南年鉴》已成为科教人员的资料专库

年鉴资料全面系统、真实权威,一直受到科教人员的青睐。近年来,科研单位和学校科研人员以及志鉴爱好者到《灌南年鉴》编辑部查阅、复印年鉴资料的人数逐年增多,并围绕灌南的历史文化、水陆风光,挖掘整理了二郎神文化、吴承恩祖籍地等一大批地情研究资料,为保存灌南历史、传承地方文化做出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还为二轮《灌南县志》的编修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历史资料。

3、《灌南年鉴》已成为内外交往的友好媒介

创刊以来,有近百名在全国各地工作的灌南籍人士来函来电索要或购买《灌南年鉴》,以便通过年鉴了解家乡的发展和变化。为扩大年鉴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我们与中国学术期刊电子杂志社合作,将《灌南年鉴》全文载入中国知网,还与国内几十家年鉴建立了稳固的交流关系,使之成为友好交往的信使、展示灌南形象的名片。

4、《灌南年鉴》已成为实用便捷的市民读物

《灌南年鉴》作为“官书”,为各级领导提供决策服务;作为“民书”,为广大市民提供信息服务。2012年以来,我们坚持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社会各界免费发放,让他们更多地了解县情、参政议政、服务发展。同时建立灌南史志网站,加快年鉴的数字化、信息化进程,努力为人们查询、阅读和使用提供及时、便捷的服务。

编好《灌南年鉴》,我们责无旁贷、义不容辞。为灌南未来存史、为灌南脉动而歌,将是我们一以贯之的目标追求!

(作者系灌南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灌南年鉴》主编)

责任编辑 于冰清



圆仁入海州路详解

闫祥富



圆仁在东海县线路示意图

唐开成四年(839)三月二十九日,申时,日本高僧圆仁大和尚,乘水手稻益驾的便船,到达海州管内东海县东海山东边,入澳停住,开始了他的入唐求法巡礼的海州之行。

圆仁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三月二十九日,平明,九个船悬帆发行。卯后,从淮口出,至海口,指北直行。送客军将,缘浪很高,不得相随。水手稻益驾便船向海州去。望见东南两方,大海玄远,始自西

北,山岛相连,即是海州管内东极矣。申时,到海州管内东海县东海山东边,入澳停住。从澳近东有胡洪岛。南风切吹,摇动无喻。其东海山纯是高石重岩,临海险峻,松树丽美,甚可爱怜。自此山头有陆路到东海县,百里之程。”

从公元 839 年到 2017 年,时间已过去了 1178 年。日本高僧圆仁在 1178 年前“入唐求法巡礼”时,写下一本弥足珍贵的日记,名为《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它的出版发行,为今天的中日韩及世界各国研究“一带一路”的专家学者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证据。

圆仁在日记中记录了他在唐九年中,曾三次到过今天的连云港、唐代的海州。第一次是在唐文宗开成四年(839)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十三日,在海州计 14 天时间,时间最长,路程最远,收获最大。第二次是在唐会昌五年(845)七月十五日至廿日,在海州计 6 天时间。得出海州“人心孝顺,见客殷重,等闲相接,县司用心亦善”的赞语。第三次是在唐大中元年(847)五月十四日至二十三日计 10 天时间,在海州界东海山田湾浦,泊船候风。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的唱响,我市及中日韩研究圆仁的专家学者,发表了大量关于圆仁入海州的文章。特别是圆仁第一次到海州,船只靠岸、圆仁一行上岸的地点,大多数文章都说是在高公岛,还有说在黄窝或柳河。笔者经过认真阅读圆仁大师所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发现大师一行乘坐的那只便船靠岸、入澳停住的地点,不是在高公岛,更不是在黄窝或柳河,而是如圆仁在《行记》中记述的“高石重岩,临海险峻,松树丽美,甚可爱怜”的如今连云港港口,这里也符合“到海州管内东海县东海山东边,入澳停住”这三“东”一“澳”,说明只有连云港港口符合圆仁停船靠岸登陆之地。而其他三地皆不具备这些条件。“自此山头有陆路到东海县,百里之程”,此山头就是指连云镇南山上那个山头,这个山头上就有去宿城的山路,这条山路长 20 里。此山路的路况也完全符合圆仁在《行记》中所叙述的

“从此南行,踰一重山,廿余里,方到村里……(此山路途中)石岩险峻(指大马腰的坡陡岩险),下溪登岭(指先下乌龙沟后攀北大岭),……涉浦过泥(指走过北大岭至陈调元小楼、养鱼塘间水草塌的情形)”。这是千年以来,宿城人去老窑(今连云港)办事的主要山路。再从宿城去东海县治(今南城)陆路 80 里,也符合圆仁所述。

圆仁跟随新罗人艰辛地翻越 20 里山路,顺利来到宿城村新罗人宅。千百年来,苍海桑田,圆仁记录的新罗人宅早已不复存在。只有被遗留下来的宿城东北城角,在诉说宿城的苍桑巨变。

圆仁大师入唐求法巡礼,进海州,第一站是宿城村。由于他的行动在当时受到限制,虽在宿城住了两日,他也没有进入名震天下的法起寺去顶礼膜拜,这是圆仁入唐的一大遗憾。

两天后,圆仁于“四月七日卯时……从山里行,(走虎口岭古道)越两重石山,涉取盐处(今云山白果树),泥深路远。巳时,到县家。”圆仁卯时(5—7 时)从宿城出发,走虎口岭古道,再翻小金湾东小山腩,走小金湾、大金湾一溜山跟小路跋涉到唐取盐处,今白果树。走山跟小路应没有烂泥,而是沙石小道。他说的“泥深路远”,可能是指他经取盐处西往南的一条古垫,实际这里开始没有垫,后来五羊湖水渐浅,浅到涨潮时这里有一层薄水,落潮时这里就没有水了,有的是沙和淤泥,湖南与湖北的百姓为南来北往方便,落潮时就走这里过去。冬天冷,不能赤脚过,人们就搬石块垫脚,你一块,我一块。天长日久,这里被人们垫出一条简单的石垫。北边叫垫北头,南边叫垫南头。中部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海水沟,落潮浅,涨潮深,挡住人们通行。有人为了方便群众,在这里设艚,收点钱,维持生计。圆仁大师为了抄近路,走这条简易的便民垫而不走西边远处的万金坝也未尝不可。从宿城村到垫南头,行程约 20 里。

圆仁在四月七日的行记写道:“子巡军中张亮等二人雇夫令荷随身物,将僧等去。”说明张亮二人



与雇夫、圆仁同行,张亮是本地人,当然知道这路如何走了。“巳时,到县家。都使宅斋。”按时间计算,9—11点到县家,圆仁一行已走了三四个小时,这县家在哪里?根据地理专家张传藻先生生前对“县家”具体位置的考察,确定县家的位置在今中云西诸朝。理由是,张先生在西诸朝人家找到了唐时瓦当,而附近其他地方是没有的。笔者认为,这县家不是张亮的家,就是雇夫的家,他们招待圆仁午饭是不成问题的。从垫南头去西诸朝还有相当的路程,应该从垫南头往西,再从华盖山东南拐下坡即到西诸朝。

午饭后,圆仁骑驴,继续西行,经诸朝村的范庄、于庄、牛王庙及山红沟、狮子山北侧西拐向南,在狮子山西坡山脚下有一孝妇祠“娘娘庙”,圆仁却未进去朝拜,不知何故。这也可能是圆仁入海州的第二遗憾。“未时,到兴国寺……”从垫南头到兴国寺,圆仁又行了20里。

“寺主煎茶。便雇驴三头,骑之发去……行廿里到心净寺,是即尼寺。押衙在此,便入寺相看,具陈事由。”

圆仁从新县兴国寺出来,又雇驴三头,直往西行,走了约五里,便走到沙河口,进入西山古道,再走五里便到了猴嘴山头。为了赶路,圆仁大师哪里有心观赏这栩栩如生的石猴呢。转过猴嘴山头,沿着山边往东南走到鸡鸣山西侧,再往南行五里到心净寺。当时大村塔还未建,圆仁不会看见。押衙官张实与之啜茶之后,便向县家去,又雇一头驴,与张实从尼寺出发往南沿着九岭山西麓一溜山脚,行20里到东海县,到押司录事王岸家宿。

日本高僧圆仁自三月二十九日申时,到海州管内东海县东海山东边,入澳停住。于四月五日辰时偶遇新罗人,随新罗人翻山越岭进入宿城村,开始他的海州东海县之旅。在子巡军中张亮、押衙张实等人的指引下于四月七日晚,到东海县,行完“自此山头有陆路到东海县,百里之程”。

四月八日,走的是圆仁入唐首次进海州的最后

一段路程。即从东海县(今南城)坐船经小海到海龙王庙,再到西边离庙不远的州治。

圆仁在行记中比较翔实地记录了四月八日这一天,从“早朝,吃粥之后,押衙入县。少时归来”之后,东海县的县令李夷甫、县丞崔君原、主簿李登、县尉尉花达、捕贼官陆等主要官员来看他们,与之谈话,并设酒食招待他们。饭后,东海县派船送圆仁一行去海州州治。

“押衙道:‘此县是东岸,州在西岸……从此小海,西岸有海龙王庙’云云。上帆直行,从船边直过……未时,到海龙王庙……僧等三人相随押衙入州去,从神庙西行三许里到州门前。”圆仁行记的这段文字,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东海县、州、小海、海龙王庙(神庙)四者之间的相关位置,从东往西排列是东海县、小海、海龙王庙(神庙)、海州州治,里程是东海县至小海2里,小海东西长约12里,小海西岸至海龙王庙(神庙)1里,海龙王庙到海州州治约5里。从县到州共约20里。

圆仁一行在海州州治受到海州刺史颜措的接见,圆仁海州之行宣告结束。“僧等三人及行者暂住海龙王庙。从东海山宿城村至东海县一百余里,总是山路,或驾或步,一日得到。”在圆仁一行暂住海龙王庙时间里,圆仁完全有机会去考查孔望山摩崖造像与孔望山杯盘石刻,不知何故,行记上未有记载。

圆仁大师对他走过的入海州之路总是念念不忘。从三月二十九日申时,船到海州管内东海县东海山东边,入澳停住,就对这里的高石、临海、松树等环境景物进行了生动的描写,并对去东海县的道路和里程进行了揭示。

圆仁对他从船入澳停住,登岸去海州的每段路程都作了较翔实的描述和交待,路况、里程、难易、特征、人物、气候、风情等,都在记录范围。如第一段路程,纯属山路,他写道:“从此南行,踰一重山,廿余里,方到村里。今交一人送去。”指出方向是南,困难程度是重,里程是20里,目的地是村,写得十分



准确清楚。对在第一段山路中遇到的困难写得恰如其分,写出了它的特殊性。如石岩险峻、下溪登岭、涉浦过泥等。这是区别于其它任何山路的一条特殊的山路。他对此路特征的描写,为我们研究他入海州之路提供了可靠而又真实的依据。

去东海县是圆仁入海州的第二段路。由宿城村出发,经虎口岭,涉取盐处,到(西诸朝)县家用斋,为第二段路中的第一节,20多里平路,其中走垫北头到垫南头,泥深路远,是比较难走的。第二节从(西诸朝)县家出门,圆仁开始骑毛驴,到(新县村,今朝阳)兴国寺,10多里平路。从新县兴国寺(新县人称大寺)到大村心净寺,即尼寺(后称百子庵),为第三节,路长20里。圆仁一行在这里雇了三头驴,可谓“驴友”也。圆仁在这节路上,曾经过西山古道,不知这位大师在口渴时,喝没喝过古道旁“古茗泉”中的圣水?第四节路是从大村尼寺到东海县,路途20里。行记中是这样写的:“啜茶之后,便向县家去。更雇驴一头。从尼寺到县廿里。晚头,到县,到押司录事王岸家宿。”这节20里路,从北往南,基本是直路。但必须走山边小路,因为下边是海,即小海也。这山叫九岭山,从北向南有九个山岭相连,亦称九嶷山。

从宿城村至东海县,路程80里,圆仁一行一天赶到,实属不易。其间租用了四头驴,挤出一些时间,用于吃午饭,进兴国寺、心净寺,啜茶,与寺人交流佛法礼仪,与官家对话探情,始终不忘求法、不忘初心。

圆仁走完这条入海州之路,离今已有1177年。那时的宿城村到县、到州,只有这条路可走。反之,海州州治、东海县治到宿城,也只有这条路可行。今天,这条山路、小路、古道,走的人已是很少了,走完全程的也只有那些考古探索者。这条路上有的地方已变成了公路大道,海路变成了陆路,有的山路古道还依然存在,如连云港至宿城,圆仁所走的那条山路。朝阳西山那段古道,基本还是老样子。虎口岭那段下山古道依旧完好。这给我们研究或重走圆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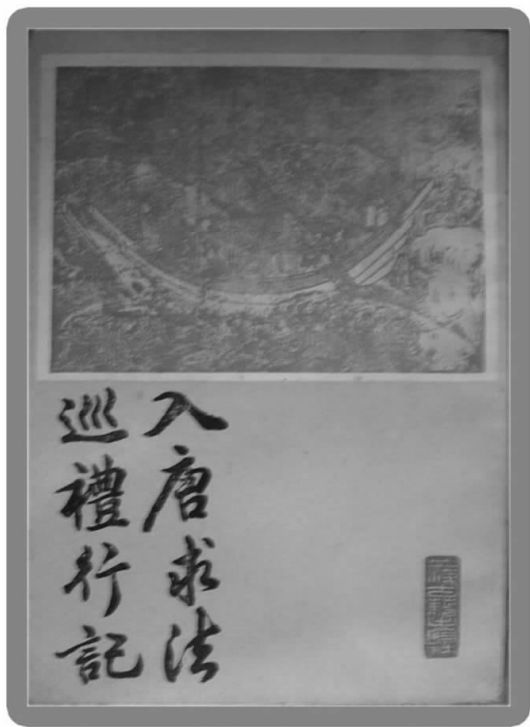
入海州之路、研究佛教与丝绸之路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圆仁首次入澳,那澳如今已建成东方大港——连云港。连云港通航四大洋五大洲,年吞吐量两亿吨以上,“一带一路”从这里起航。

圆仁首次入宿城山路之底,新开的“云台山隧道”穿山而过打通宿城,20里山路变坦途,里程缩短为7里多。当年的宿城村变成了今天的宿城街道。圆仁当年没见到的“上法起”变成了后来的“下法起”、今天的“新法起”。出宿城的虎口岭古道一侧兴建了绕山水泥公路,乘车出行十分便捷,不再自古虎口一条路。圆仁第三次路过泊船候风的田湾浦扒山头已建成田湾核电站。沧海桑田,当年圆仁入海州经过的五羊湖、小海,已经建成开发区、高新区、新海州区。古丝绸之路变成通向世界的新“一带一路”,圆仁之路变成新港城大道。

(作者单位:连云港市连云中学)

责任编辑 邱仕明



《入唐求法巡礼记》封面

淮盐与古海州水运

胡可明

古海州地域淮盐历史悠久,成形于汉初,唐宋步入稳定发展期,元代跃上一个高度,明清则达到鼎盛。因其量大,要销往朝廷指定的销区,外运一直是十分重要的事。在生产水平局限下,淮盐外运一向以水路运输为主。本文就古海州地出产的淮盐从水路外运的信史及学术著作中遍拾珍珠串而成文,以飨读者且接受指教。

高歌淮盐旋律过千年的盐河

查阅诸多史料,未有唐以前古海州出产淮盐的外运通道文字记载。《资治通鉴》《中国盐业史》载,唐时淮盐即行销于东南半个中国,而以销售古海州

淮盐为中心任务的泗州涟水,则居于咽喉之地、商贸中心。唐高宗咸亨五年(674年)后,泗州涟水有了新漕渠,与开挖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的大运河相通,达于当时淮盐运销中心之中心的扬州,这是最早的淮盐南运的水路文字记载。到唐睿宗垂拱四年(688年),朝廷又修浚新漕渠,由泗州涟水北连海、沂、密诸州,形成一条重要的盐运通道,古海州出产的淮盐可由此水运通道直送淮盐中心扬州,而分销于朝廷指定的销盐引地(销区)。到唐玄宗、肃宗、代宗(712—779年)时,盐铁史刘晏设立十监四场,在涟水设场来管理古海州运销之淮盐,即是因为有了这条运盐水道。此河道为官方主导、

官方出资、官方主办、官方管理,故称“官河”。《新唐书·地理志》及当时来唐日人文章中,都有关于官河的记载。这条官河掘成,不仅解决了漕运之需,更是成为了古海州、古泰州淮盐外运的一条水上黄金通道,使淮北盐区盐斤向扬州集中及外运外销更顺畅更便捷,反过来又刺激了古海州淮盐生产的不断发展。

至北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两淮盐区有26个盐场,其中海州有板浦、惠泽、洛要3个盐场,朝廷额定每年出产淮盐四十七万七千石。是时淮盐走私已属猖獗,私盐数量定然不菲,古海州



繁忙的盐河水运(盐河灌南段)



淮盐年产量定高于朝廷额定指标许多。北宋时淮盐自真州(今扬州仪征境)沿长江西运,而泗州涟水设有淮盐转般仓转存古海州淮盐,表明其时古海州淮盐仍沿官河运至涟水。

巨量的古海州淮盐,给朝廷提供了巨额的财富,官府必得努力保证官河这条黄金水路的畅通。北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春,淮北大旱,官河水位枯竭,古海州淮盐不能按量按时运输至扬州,朝廷命盐运使衙门征调民工疏浚官河。海州知州孙沫以“春耕大忙,疏浚官河贻误农时”为由,三次上奏要求停工。朝廷鉴于淮盐的经济地位和社会稳定之切,驳回奏章,坚持疏浚,从而保证了古海州淮盐运输的畅通无阻。金代,古海州有板浦、临洪、独木3个盐场,其所产淮盐仍沿官河外运外销。元代时,两淮有29个盐场,其中古海州有莞渚、徐渚、板浦、临洪4场。元代淮盐生产工艺成熟产量激增,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淮盐年产高达3.8亿斤,且以后长期保持这一水平。《中国盐业史》载其时有云:“天下大计仰东南,而东南大计仰淮盐”。历史悠久的古海州淮盐产区定当贡献亦巨大。蒙元统治古海州淮盐产区132年(1236—1368年),其间攫取了巨额盐利。元政府十分重视运盐河道的疏浚和管理,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的《恢办课程条画》中,禁止将“运盐河道开决河水浇灌稻田”,也确保了这一历史时期官河的畅通。明代开启了明清淮盐鼎盛之期。明代古海州官府为保朝廷盐利之获,对官河也是倍加关注。永乐三年(1405年)五月,对境内官河淤塞段进行疏浚。永乐十二年(1414年),疏浚古海州城南至淮安官河240里。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知州高瑶征民工18800人,挑浚大伊山至板浦官河及其互通之河景济、中正和东辛等支河,耗资9780两银。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开挖了各盐场直通盐河的运盐河,古海州的板浦、临洪、莞渚3个盐场所产的淮盐,用木帆船由生产场载出,经盐河(清时已改官河称为盐河)运至现今灌南县新安镇,再运至西坝(今淮安市境)卸入盐栈,分运销区。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建立了中河厅管理盐河,但每年修防、疏浚所需之资均为盐商捐助。是时,盐河早已成为古海州地区的第一航运水道。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古海州盐商集资大浚盐河。

嘉庆三年(1798年),盐河延伸开掘至新浦,成为古海州水运之枢纽,汇合了古海州几乎所有的河流,也是古海州与江淮乃至全国水运之咽喉。清人黎世序等主编的《续行水金鉴》写道:“官河长130里,阔8丈,盐课所经,官舫估舶,帆樯相望,故曰官河。”陈宣在《海州志》中抄录了此番描述。嘉庆九年(1804年),海州盐河大浚。道光元年(1821年)正月,挑深拓宽海州盐河。宣统元年至二年(1909—1910年)再疏盐河。

唐朝开掘官河并非仅是为古海州出产的淮盐外运,而是一条漕运通道,实际上是盐漕并行共用,是故古典均以“新漕渠”谓之。但随着古海州地域淮盐的发展,通过这条河上的货物渐次淮盐比重最大,至明代时自然定名为“盐河”了。盐河也是其沿岸如涟水、灌南、灌云等地农村灌溉、排涝的重要水道,它与古海州淮盐一样,对国家建设、社会进步、人民生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2000年8月出版的《新浦区志》说:“西盐河为新浦地区主要水上运输航道……全年船流量上行6.5万只,下行7.17万只。”2014年1月出版的反映连云港市对外开放三十年成就纪实的《云路飞歌》写道:“总投资3.67亿元的盐河整治工程,2009年12月开工,完成市境内近16公里工程项目。至‘十一五’末,市境内定级航道基本形成以盐河为主通道的重要水系航道体系。”

哼唱淮盐小调众多的河流

流淌了一千多年的盐河,不知承载了多少吨位淮盐船舶的航行,也数不清有多少满载盐外物品的船舶顺着不尽的盐河水南来北往。同时盐河也为沿岸农田灌溉,为其流域洪涝排水,也供两岸人畜饮用。在起点之涟水县的十大河流中,盐河被称为“母亲河”。得益于古海州淮盐中转枢纽的独特区位优势,其河道一直保持在可通航800吨大船,是涟水县调用洪泽湖水为农业灌溉的主要河道,洪水季节也起分洪作用。涟水县境的北六塘河、南六塘河、一帆河、公兴河、西张河、杰勋河等都与盐河互通,涟水与灌云、东海、赣榆、沭阳同属古海州淮盐销区近场五岸,这些河流成为从盐河上运载而来的古海州淮盐的分销运道。而早在唐代宗时朝廷就在涟水设



有海口场,其所产淮盐也通过盐河外运进入淮扬盐栈,内由与盐河互通之河流分销于本县境城镇乡村。

盐河从涟水县境流出而进入古海州境即今之连云港市灌南县,遂与此县的灌河、武障河、南六塘河、柴米河、义泽河、一帆河、龙沟河、公兴河、唐响河等水脉相通。而该县境明洪武元年(1368年)即由淮安府在境内东部地区设了莞渎盐场,这些与盐河相通的河流,也必曾或多或少地承载了运送淮盐的船舶经过。坐落在县城新安镇的新安港,循盐河两岸建码头,就曾是连接盐河与县境其他河流转驳淮盐之所。

盐河流入到灌云县境,水面上那咸味是越来越浓。《灌云县志》载,盐河在新坝与涟河交汇,接临洪河入海。县境内与盐河直接或间接水脉相通的河流较多,如古泊善后河、车轴河、牛墩河、五图河、六里河、枯沟河、烧香河等。其中车轴河旧属盐漕运道,古泊善后河是盐场运盐至板浦集散的主航道之一,烧香河是自然河流也是盐漕运道。《灌云县志》将这些大河列入了县境干河序列。灌云县本身历史上就拥有几个淮盐生产场,是古海州地域生产淮盐最多的县,同时也是古海州盐的销区。毫无疑问,包括若干条大河与不知具体数目的小河,无论与盐河水脉相通与否,必定对古海州淮盐的集运与散销做过贡献。

明代直至清初,古海州临兴场产盐由蔷薇河运抵新坝入盐河向东经磨行盐关(在今大柴市)查验,而南运至淮安。蔷薇河淤塞后,磨行盐关裁撤,临兴场盐由船运入海,至板浦西北卞家浦之洪河堰卸船,再经盐河转运外销。

清嘉庆往前,古海州临兴场所产淮盐全由海口运至洪河堰,通过板浦盐关,转入盐河外运。嘉庆三年(1798年)后,潮退陆进,盐船运输渐受困阻,临兴场盐商出资改造河道,在卞家浦(今海州锦屏镇的卞河口)以北、海州城以东之处,挖河通海,盐商在此建了码头和包垣,向盐河中转淮盐。此处后被定名为“新浦口”,新挖的河定名为“新浦河”。嘉庆九年(1804年),海州知州唐仲冕应民之请,开挖了一条甲子河,与新浦河沟通水脉。此河改变了“自孔望山而至州城七八里,崖岸萃确,舟楫不通,城无市

廛,米薪缺乏”境况,开通了古城海州与盐河沿岸、大运河沿岸的联系。新浦口原只是一个运盐小港口,后也拓展为盐和古海州的农、渔、副及花果山茶叶等诸种物品齐运并发、甚至有一定客运功能的综合性港口。

蔷薇河是古海州最大的一条河流。它南通老黄河,北与盐河相通,直通盐仓。《隆庆海州志》和《连云港市志》都说,明代时,该河即为古海州的临洪、兴庄两盐场外运淮盐的必经航道,故而明清两朝屡屡疏浚,使之保持运送淮盐、漕粮的船舶畅行。如嘉庆二十四年(1545年),蔷薇河已经淤塞到不能接入盐河正常运盐,官府招募民夫2440人,以贍罚银2000两浚蔷薇河十余里,又用盐商积引余银5600两浚运河四十余里,还在海口处筑5道堤坝挡潮杜咸,终使蔷薇河“舟楫复行”,盐粮诸物运输复畅,且又保障了流域农田正常耕作。康熙十四年(1674年),海州知州孙明忠改蔷薇河名为“玉带河”,予以疏浚。其后的康熙四十二年(1730年)、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和三十五年(1770年),又都因为古海州淮盐外运之需几经疏浚。直到六七十年后的道光年间,古海州票盐仍经此河外运。

据传连云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所在地旧名黄九堰,就与古海州淮盐水有一段历史渊源。原来在北云台与中云台之间是海面,只因中云台山上有五个羊形的石头,人们把这片明明是海的地方,称作“五羊湖”。这片海面当海退时则干涸为滩,隋唐时湖底朝天,唐后期至宋时为海,明初为陆,中后期复为海,至清道光年间,五羊湖已完全成为陆地且不再复海。但在中云与云山乡留下一片水面,人称“西湖”。清人张百川写道:“自咸丰元年(1851年),商人挑半边河运盐,湖遂涸。”半边河切断了“西湖”上形成的行人通道,故此河被时堵时开。光绪年间有个家中排行第九的黄姓产盐人氏,受雇专司半边河拦堰走人、开堰行船之职,日子长了,人们遥指此处为“黄九堰”。

低吟淮盐乐谱的黄海波涛

《连云港港志》说,古海州所沿黄海之滨,因诸多河流由此入海,形成了像大伊山、柘汪、朐山口等可供停泊的天然港口。秦时海州就成了天然的避风



良港,称古胸港。食盐由政府额定产量、划分销区及行运路径,都是由水路驳运。清嘉庆三年(1798年)后,蔷薇河淤塞,临兴场淮盐船运入海,傍海短途转运后,仍归回河运。此事既非淮盐规模海运,更未形成淮盐海运定制。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成立济南盐场大阜制盐公司、公济公司,始有淮盐由埭子口海运外地。宣统三年(1911年),公济公司在其场区滨海的天生港(后被张謇改名为燕尾港)建立海运处,专管本公司产盐海运事务,由袁姓盐商在此建一座小型木质码头,并于民国5年(1916年)在燕尾港建筑盐坨2880平方米,可堆存盐廩36条,储盐量高达5万吨。还在距岸不远的开山岛上设报潮标和灯桩,在燕尾港对岸的小东港设有导航标,以保海运安全。另备有小型机船一只,专为大轮进出港领航。民国8年(1919年)购置一艘2000吨级轮船运输盐斤。到民国18年(1929年)11月,公济公司又对原码头进行改造,改木质一字型码头为钢筋混凝土的T字型码头,可泊3000吨海轮,本公司产盐由此经船运入长江口,分销各引岸。燕尾港还是灌河入海口,该河上通盐河,公济公司盐码头建设及使用,使燕尾港最早成为古海州盐区盐斤海河联运集散地。

民国6年(1917年),济南盐场的大源公司在灌河西的4条埭子所产之盐,济南盐场大德公司在海州灌云县洋桥镇所设盐场每年堆存的1200吨盐斤,均借用公济公司燕尾港码头海轮外运销售。同年,大源公司购进小轮船装盐海运。其后,济南盐场其他公司竞相效仿,单只轮船吨位增至2000吨。民国7年(1918年)时,大源公司在陈家港耗资3.4万元自建了码头,该码头栈桥长70.9米,宽5米,入海前端与浮桥连接,可停泊3000—4000吨级轮船,本公司盐斤全数海运。民国8年(1919年),济南盐场大德、大阜、大有晋三公司合资3.8万元,在灌河北岸的堆沟港建成了3000吨级德阜晋盐码头。码头呈T型,全长46.45米,宽9.5米,距水面高9米,栈桥长84.95米,上下游各有一座15米的薄井型码头,码头全部采用钢筋混凝土建造,可停靠千吨级的轮船,岸上还有可堆存5000吨盐的坨地,并铺设轨道,与码头连接。该码头距入海口仅3.24海里,港口深泓及岸,常年不淤,常年

不冻,是转运古海州淮盐的绝佳处所之一。可惜民国28年(1939年)日寇在灌河口登陆,该码头遭其破坏,后来仅能停靠一些小船。同在民国8年,济南盐场裕通、庆日新二公司集资3.9万元,在陈家港建成了裕庆码头,码头可停泊3000吨级轮船。民国14年,济南盐场大有晋公司又独资6.4万元,在灌河南岸蟒牛港建成蟒牛码头。民国20年后,每年从济南盐场在灌河两岸诸港口码头运出大批淮盐,时每担盐法币3.6元,缴纳税金3元,其中0.25元支付码头费、职员和盐工工资以及设备费用。英国盐务大臣来济南盐场考察时说:“日望江苏八百万(元)”。民国19年,中正场始行盐斤海运,由盐垣商承包海口运务。后在东隅山建海运码头,先木帆船后改用轮船。邻近中正场的南方洋、高公口两海港,也相继成为淮盐海运港口。板浦、临兴二盐场产盐曾是经临洪口以木帆船驳运至海上装轮船海运,后大多在高公口、西墅口出海。临兴场于民国21年耗资12.1万元,筑成三洋港盐坨一座,堆存盐斤55万担。至民国23年,古海州盐场海运淮盐全部实现轮船运输,临兴场为临洪口,板浦场为高公口、西墅口,中正场为埭子口,济南场为燕尾港、堆沟港、陈家港、蟒牛港,这些港口和坨地码头,都在日寇侵略登陆前,大批量地转运淮盐去内地。赣榆的柘汪港,在抗战中运出淮盐80万担。

清代时,淮南淮北两淮盐行销长江流域、江淮平原计6省250余州县,其中道光年间古海州即行销皖、豫、苏三省的49个州县。清后期直至民国时期,淮南盐产量锐减,其所属销区均由古海州淮北盐接济。民国24年,济南盐场海运盐斤到扬州仪征盐栈,改散装为麻袋筑包成为时尚,国民政府盐务署令在全国各盐区推广其做法。古海州各盐场的诸海运港口,为淮北盐斤外运外销提供了无可替代的保障。1951年,燕尾港、陈家港、堆沟港等海港,由连云港务分局接收,但诸港海运淮盐任务不变。20世纪80年代前,淮北盐行销范围更是扩大到270个县(市),供2亿多人口食用。

(作者单位:连云港淮盐文化研究会)

责任编辑 邱仕明



连云港历史沿革史话(十二)

——隋唐五代时期海州地区州县行政建置(下)

刘凤桂

一、唐代的海州地方州、县行政机构

唐初的地方行政机构如上节所述,最高行政长官是州刺史。玄宗天宝元年(742)后历 15 年改州称郡,长官则称太守。肃宗至德元年(756)恢复州制,仍称州刺史,官位从三品。据《唐六典》《通典》《资治通鉴》等史料,按唐制,州刺史下属僚佐主要有上佐、判司和录事参军,辅佐刺史一州的行政事务。上佐指长史、司马等,没有什么具体职事,多为安排冗员的职位。长史官位从五品上,司马从五品下。唐后期的中、下州一般不置上佐之职,海州属中等之州,故自肃宗起亦不再设置上佐之职。具体管辖州内行政事务的是录事参军,领司功、司仓、司户、司兵、司法、司士六参军,与朝廷的尚书省的六部相对应,具体分管官吏考课、礼仪、赋税、仓库、户口、驿传、刑狱和工程水利等职事。判司则负责监察、举劾本州六曹官吏,对应朝廷的御史台和尚书省左右丞的职责。唐代的州一级政府官员中还设经学博士、市令,负责学校、医药和市场交易,属判司聘用的吏员。

唐代县级行政机构的最高行政长官为县令,从七品(也有正七品的)。下设县丞、主簿和县尉作为主要僚佐。县丞是县令的副手,主簿主要负责勾检稽失,监察官吏,地位相当于州的录事参军。

唐代海州下辖朐山、东海、沭阳、怀仁四县。东

海县设在云台山。这里有一个过程,即唐初武德四年至武德九年(621—626),曾在云台山建环州,下辖东海、石城、青山、赣榆四县,州治在东海(今南城),州、县同治一处。石城县即今墟沟北固山南附近;青山应该是今中云台到南云台一带;赣榆,大约今之朝阳(古称新县)一带。武德九年将石城、青山、赣榆撤并入东海县,其主要原因是其时云台山地广人稀,山林覆盖,可耕地不多,赋税不济,撤并是明智之举。这样一来,以州并县,东海县的地位就大大提高了,成为上县,即户口在 3000 户以上(据开元中户籍划分,下同)。唐初,今赣榆域境有怀仁、祝其、利城、新乐四县,武德五年(622)省新乐入祝其;七年省祝其、利城入怀仁,治域的扩大使怀仁成为中县,即户口在 3000 户以上,亦因户口稀少问题。关于沭阳,唐初原隶属海州,后曾于高宗总章元年(668)隶属过泗州,咸亨元年(670)复又隶属海州,将厚丘并入,为中县,户口亦应在 3000 户以上。

关于海州属县的机构设置,我们举云台山《郁林观东岩壁记》摩崖石刻为例。此刻是我市保存完好的唐代石刻精品。文首称石刻“维大唐开元七年(719),岁在己未”。正处大唐开元盛世时代,州县建置十分完备。文末记有“其列座同志,次而镌诸:司马男清河崔逸文。朝议郎行海州司马崔惟怿字践



直、朝议郎行东海县令元暖字微明、丞阎朝宾、主簿孙克友、尉苟抱简、尉上官崇素、司兵宴晏”，参与游兴的人物及其各人之官职。其中司马崔惟怿，是唐开元七年的从五品的海州州级官员，撰文者崔逸乃其子。时任东海县令的元暖是游兴郁林观雅事的发起者，这是一位在海州历史上颇有政绩的县级地方长官，在任上修筑捍海堰，外挡海潮，内蓄山水，使民获灌溉之利。刻文中所载元暖随从们的职衔如县丞、主簿、县尉、司兵等职官，以石刻文物资料印证了唐代县级行政机构设置的情况。也许人们要问，在崔惟怿、元暖官职前何以要冠以“朝议郎”一词？朝议郎是唐、宋时文散官衔位名，正六品上。此证元暖非一般的正七品县令，其职位仅低于受邀嘉宾从五品下的海州司马崔惟怿，故其身份表明了东海县当时在海州诸县中地位的重要。朝议郎作为文散官，是一种阶官的通称，乃有名无实的一种官名头衔。

唐代在设置道（见上节所述）的同时，还为显示其地位的重要把京都和曾作为陪都的州称为府。府的行政机构与州相同，仅为设官之名称。后稍有变化，其长官称尹（如京兆尹），为正二品，副职称小尹。此外，在边疆地区的西都、北都、东都设府进行管辖，长官称都护，副职称副都护；或亦称尹、小尹。府的称号到元代完全成为高于并统辖州的地方行政名称。明清因袭不改，府、州作为上下级行政关系，州、府不可并用。

二、唐代海州县以下的乡、村行政管理

据《唐六典》（卷1），唐代的行政隶属关系的文书格式是：“尚书省下于州，州下于县，县下于乡，皆曰符。”其中“符”是官方下达文书的印记，相当于现在的公章。乡是唐政府官僚体系中最低一级机构。武德七年（624），唐律令规定：“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四邻为保。”（《资治通鉴》卷109）《通典》则进一步将乡、里的管理机构予以明确，即：“大唐百户为里，里置正一人；五里为乡，乡置耆老一人。”“贞观九年（635）每乡置长一人，佐二人。”不过唐初这一乡级官员的设置到贞观十五年（641）便省去，盖因新增乡级官员数量太多，政府支付俸禄难以持久。但我们也可以看出，唐初仍然延续了汉魏以来的乡官制度。里正、乡长都算是体制内的政府

官员。后虽废去乡长及属官佐之职位，但县之下的广大乡村还是需要管理的，故“乡”作为地域区块仍得以存在，只不过将管理乡的权力转到轮值的“五里正”身上。唐代诗僧王梵志有诗曰：“当乡何物贵，不过五里官。”（《王梵志诗校注》卷2）说明“五里一乡”的制度一直存在。唐代海州的乡，据《元和郡县图志》载：海州“开元户二万三千七百二十，乡四十”。另注：“元和户数传写缺。”具体乡名该《志》未标。但据今《朝阳镇志》，在朝阳西山原“三十里记里墩”石刻附近发现的《茗泉碑》碑文中记有北宋哲宗（1098）“东海县苍梧乡诸韩村”的地名。按宋承唐制，可推而认知唐代东海县亦应有苍梧乡，且其乡之下有诸韩村，此诸韩村地名一直沿用至今。我市许多乡的古名，如灌云的伊芦、龙苴；赣榆的怀仁、沙河；东海的曲阳、羽山等，都可能在唐代就有其名。

谈到唐代的村，张国刚先生《唐代乡村基层组织演变》一文指出，唐前期，乡设耆老管理一乡事务，贞观十五年后废乡官，改由里正轮值管理。乡所管的村有村正（又叫村长）。在田野称村，在城邑称坊，坊是唐代城市市政管理的一种区划，故村、坊不可混称。唐文宗时来华的日本请益僧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提到他从胡洪岛（今连云区高公岛）登岸后不久，遇到时居住在今宿城乡的新罗人，他便谎称自己是新罗人而得以暂时入住新罗人家，被附近一个村叫王良的村长发现，具文报告东海县令，后由官府派人将其解送到东海县衙。圆仁称此人是“村长”非“坊正”。这里说明了两个问题：一、唐中期后县是直管村的，圆仁被解送至东海县衙其间并无乡一级的里正参与；二、当时新罗人居住地应该叫新罗村，而不是新罗坊，此与历史记载不悖。因为据《唐六典》，当时只在楚州（今淮安）和扬州设有新罗坊，其他地方未设。

三、唐代海州的涉外管理

大体上在九世纪以及十世纪初，唐朝的山东半岛沿海一带（包括海州）分布着一些新罗侨民的村落，称新罗村。这些新罗侨民的形成，起因是九世纪初，朝鲜半岛出现大饥荒，发生了许多人家“卖子孙以自活”的惨剧。同时又缘自淄青节度使割据时期掠夺、贩卖新罗人口活动的猖獗和以后唐朝解放新



罗奴隶政策的实行;当然也与这个时期新罗著名的“大将军”张宝皋在东北亚地区的海上商业经营活动有关。上节所述819年,唐宪宗平定了纵容人口贩卖的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割据势力,任命薛平为平卢节度使,开始取缔贩卖新罗人时间有违口非法活动。后在薛平的要求下,放归滞留在中国境内的新罗人回国。然其中多数新罗人已离开朝鲜半岛多年,他们寄居在山东(含海州)沿海小村,安家落户生儿育女,多数选择留在唐朝定居而成为侨民,主要从事农耕和烧炭、修造船只等生业。其时在山东半岛的登、莱、密、沂以及海州沿海一带形成了众多新罗侨民村落,宿城新罗村即是其中之一。这些新罗人聚落的村建有“新罗押衙所”自治组织,其“押衙”一职由新罗侨民来担任,相当村长之职。“新罗押衙”是管理新罗人居住区内治安的职务。新罗村押衙所在县级政府行政管辖之下,遵循唐朝的法律制度,并无“治外法权”。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在宿城时有“请勾当垂悯交往”“兼押衙使下有三四人在此探候”等事,“勾当”为唐宋俗语,意为处理、办理。圆仁的这条记载证实了海州、东海县两级政府严格执行了对新罗村的行政和治安管理制度。

圆仁来华滞留海州也涉及到唐代海州的外事管理问题。

唐代是一个对外开放的朝代,是中国历史上海、陆丝绸之路的鼎盛期。大唐盛世将中华文化远播海外,同时也广泛吸收外来文化。唐中央政府设鸿胪寺接待各国使节,在三省六部因外事需要又设主客司,有主客郎中被“授其外臣之事,朝聘则定位”;地方上,唐政府规定设置“铜鱼符”作为陆上边境地区“蕃客”(唐代对外国人的称呼)入境凭证;在沿海地区,据《唐六典》卷十八,凡入境州县的外国人,“具其名数牒”报鸿胪寺,有寺司审查(“堪讫”)报中书省(“仍牒中书”),等候上岸入境通知(“别听进止”)。圆仁在宿城新罗村时,王村长所报文书中云:“和尚到此处,自称新罗人,见其语言,非新罗语,亦非大唐语。见到日本国朝贡使船,泊山东候风,恐和尚是官客,从本国船上逃来。是村不敢交官客住,请示以实。示报,莫作妄语。只今此村有州牒,兼押衙使下有三四人探候,更恐见和尚。”这里表

明,唐政府对海上来的外国人(即“官客”)实行州牒注册(相当于今之“护照”)制度,来华外国人须食住在官府指定场所,民间不能随便接待。当时海州有一位专门处理外国人从海路入境事务的官员,名叫张实,其职位是“押衙兼左二将军四县都游奕使、朝议郎、试左金吾”,官位从六品。这一大串官名,真正管用的是“四县都游奕使”,行使的职责是“勾当蕃客”即处理外国人入境事务。圆仁被确认是从日本朝贡使船上逃出的身份,便被海州政府命令“拟往本国船处,驾船回国”,可见,海州州县设有外事管理部门,严格执行了唐政府的外事管理制度。

唐代因两淮盐业兴盛,盐税成为国家税赋的主要来源。为了解决官府盐运(唐实行政府盐业专卖)和便于管理,打击私盐,早在武则天垂拱四年(688),唐中央政府就拨款利用游水故道开挖了一条“官沟”(又称官河,见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入涟水与淮河及运河相通,以促进海州与南北的内陆联系。主要为便利海州、沂州、密州、泗州等地运米、盐。南下,大体上以板浦为内河枢纽,运盐等物品入楚州(今淮安)顺大运河南下至当时的大都会扬州,从而纳入国家贸易渠道。海州负责河运的官员是六参军之一的司户参军。

四、五代时期的海州行政管理

唐天祐四年(907),在镇压黄巢起义中新发展起来的藩镇割据势力朱温(852—912),通过禅让形式夺取了昭宣帝位,代唐称帝,建国号梁,改年号为开平。由此中国历史进入短暂的五代时期。虽号称“五代”,然各朝立国寿命都短,后梁17年,南唐39年、后晋12年、后汉最短,仅4年,后周10年。五代时期另有十国,其中杨行密建的吴、徐知诰建的南唐以及五代郭威建的后周与海州有一定关系,海州先后属后梁、吴、南唐和后周,各朝都行唐的法度,故州县建置未见改动。

(作者单位:胸海书院)

责任编辑 邱仕明



黄窝碑刻

胡可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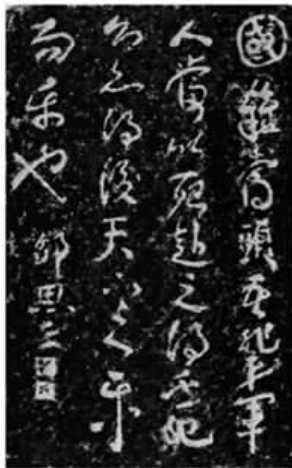
①



③



②



④

古村黄窝,位于北云台山东端,连云区高公岛街道办事处。这里凭海临风,风光旖旎。由于交通不

便,与外界联系较少,恍若桃源。这里,人文荟萃,碑刻众多,笔者对五处有较大影响的碑刻进行了深入地研究,现将研究成果公之于众,以求教于方家。

龙潭涧“全真庵”石刻

“全真庵”石刻位于黄窝景区入口处,地处狭窄旁道,十分隐蔽,石刻分为紧邻两处,一处面南,为“全真庵”三字(见图1),另一处石刻面西,为一首七言绝句:“海阔山峨洞府低,蓬壶阆苑海东西。仙人玉女时游集,不让桃源过客迷。”落款为“长春师傅”。

我在对中云街道和云山街道的一些古村考察时,发现在这些地方都有“全真教”建筑,中云的叫“长春庵”,云山的叫“纯阳庵”,纯阳庵遗址还有南宋皇帝的年号“咸淳”。由此可见,南宋时期全真教在海属地区很流行,黄窝全真庵当创于南宋。

至于为什么用“长春师傅”署名,“长春师傅”曾经是著名全真道人丘处机的称呼,也曾经是全真道人张志朴的称呼,所以这个称呼应该是宋元时代全真教的代表符号,已经不拘泥于某个特定的人了。教徒共享名号的现象很常见,如“蓑衣道人”这个名号,张姓、何姓都用过。

全真教在宋元时期盛行一时,明清时期走向衰

落。

里石门白宝山诗刻

从“全真庵”石刻向上走1公里山路,黄窝水库西北侧,当地老百姓称为“里石门”的地方,一块巨石上刻有“海州王”白宝山的五言律诗:

山中避世事,海上即神仙。

应节榴初放,当头月正圆。

功名诚蔽履,道德有真荃。

为爱青霞影,乘桴泛晓烟。

最后是“白宝山”题名和两方印,没有题刻的时间。(见图2)

白宝山于1909年以“定武军第四路统领”的身份进驻海州,到1937年抗战爆发离开墟沟,在这一地区驻扎达28年之久。在诗刻周围还有他的车站、别墅、洗澡堂等设施,这里是他除了墟沟“乐寿山庄”以外最好的居所。

为什么要选这里作为他的“第二庄”呢?一是看好了这里的“屯兵环境”。该地位于北云台主峰大桅尖下,自古即为兵家必争之地。曲径两侧,中间低两边高且林木茂密,非常适合伏击。二是这里位于大山深处,几近与世隔绝,是极佳的隐居场所。这首诗中“应节榴初放,当头月正圆”一句描写作诗的时间是“榴初放”那个月的“月正圆”时。根据当地山民的描述,榴花初放应该在农历四月,“月正圆”即农历十五。除了这句描写作诗时间外,其余都反映消极颓废和无为的思想情绪,其中“神仙”“道德”“青霞”等词很明显和道教有关,这说明,此时的白宝山已经失去了积极进取的精神,追求一种“厌世、逃避”的道教徒生活方式。很显然,这是1931年白宝山被蒋介石明升暗降为军事参议院少将参议,失去兵权后情绪的流露和发泄。白的好友税警总团团长黄杰在赠给他的诗中有“还当为国操金戈”的话,显然是针对这种想法的一种劝导。

白记地界石刻

在大桅尖下南侧,沿乌龙沟向下,在水坝南面

不远的地方,正是黄窝最丰腴的山场,诗人张学翰“石门雨过万峰青”即指这一地段。

40年前笔者就在这里发现了一块石碑,上面写着“白记,北至大涧,白东界。”(见图3)这是笔者看到的北云台地区唯一以文字和固定岩石划定的山界。因为山民们从未经历过买卖山地的事,更不知道应该索价多少,可能有军阀利用权力强买的做法,但山民无据,只得默认。所以可以把这种买卖视为平等的交易,界约确定后,因为有“白大人”的信物,20多年时间里无人染指。白宝山撤走以后,家父1947年从新浦回来还曾利用过这片山林,一直到被人民公社成立“赎买”入社结束。

飞来石邵恩三抗日石刻

听老人讲过,侵华日军上岸前,大桅尖以下有军人驻扎,先后有四支军队轮番把守,即税警部队、国民革命军第57军112师、税警部队胡文臣部、国民革命军第89军33师。当笔者问到“邵恩三”这个指挥员时,老人们说以上4支部队中,没有这个人。

后来在笔者去飞来石春游时在飞来石杂乱无章的“留言”中看到邵恩三题写的“国难当头吾辈军人当以死赴之得不死则亦得后天下之乐而乐也邵恩三”石刻,特别惊喜。经查阅军事史资料,才知道邵恩三是个抗日英雄,生前为国民革命军40军39师115旅220团团长,后升任第24集团军少将处长,1943年4月在山西与日军战斗中牺牲。1937年底来连云港是休整补充,在连云港的时间不到4个月,而且因休整而来,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个人。(见图4)

该作品笔力强劲、潇洒飘逸,这样的好作品竟然出自一位戎马将军的即兴之作,真是令人惊叹!

龙潭涧摩崖石刻

古村黄窝是个闭塞、落后的渔村,500年中几乎无人问津,真正将黄窝推介出去的是新县张家百忍堂家族的几代。清康熙年间,百忍堂张家有位叫



张朝良的塾师,晚年著《东瀛诗草》,其中《秋游黄窝山》将雨后的黄窝描写得惟妙惟肖:

暑气才消添一雨,洗将山色总成秋。
峰清好共高僧瘦,峦静几如美女幽。
半壁风翻黄叶路,四围云拥翠微楼。
会当绝顶同攀桂,唯愿清香散满头。

自从张朝良游黄窝后,他通过游学将这个“世外桃源”推介出去,1920年张恩沛步先人张朝良踵来黄窝“设帐”教书。他的族兄张学瀚为了他的著作《云台导游诗抄》觅诗,也于1921年夏来黄窝采访,于是就有了“龙潭涧诗刻”这处著名的文化景观。(见图5)

位于诗刻上首的是族兄张学瀚的《民国十年夏咏龙潭飞雪》:

山势崔嵬列画屏,龙潭飞雪偏珑玲。
浪涛瀑影和烟挂,风送涛声拍枕听。
梯路云峰千树黑,石门雨过万峰青。
黄窝仿佛桃源境,赏月观花且颂经。

这首律诗,以传统的手法直接描写黄窝景观,正统、大方、入流,不作秀,用最常见的楷书字,落笔遒劲、豪放飘逸,利于匠人锤刻。云台山地区的石刻多采用此体。

位于诗刻下首的是张恩沛的七律,无题,以小序直入正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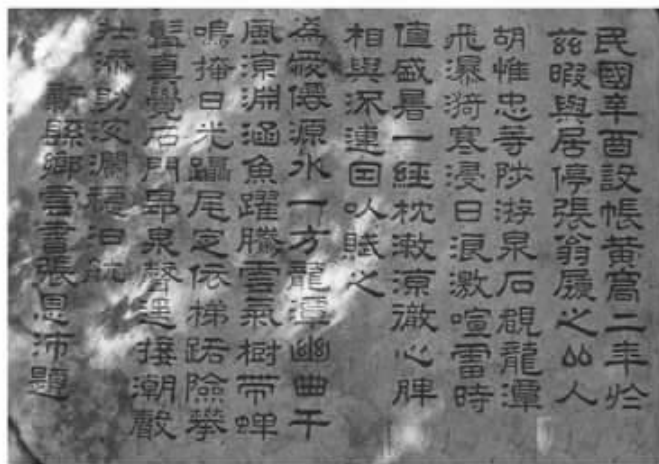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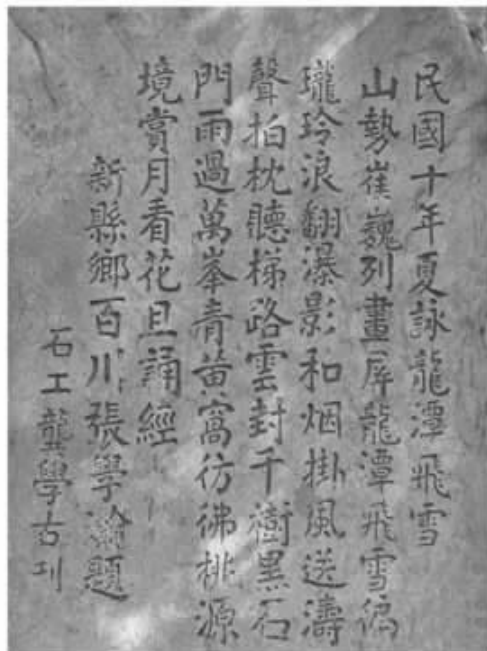
民国辛酉,设帐黄窝二年,于兹暇于居停张翁履之、邻人胡惟忠等陟游泉石,睹龙潭飞瀑,漪寒浸日,浪激喧雷。时值盛暑,一经枕漱,凉彻心脾,相与流连,因以赋之:

为爱仙源水一方,龙潭幽曲午风凉。
渊涵鱼跃腾云气,树带蝉鸣掩日光。
蹑尾定依梯路险,攀髯真觉石门昂。
涛声遥接潮声壮,添助波澜稳泊航。

张恩沛的作品为隶书,雄浑古朴、深邃凝重。(见图6)

这两首诗很显然是两人同游龙潭瀑布后有感而作,张学瀚侧重“画境”的描写,全诗就是一幅美

⑤



⑥

丽的风景画。张恩沛的诗侧重“歌境”的描写,读之使人沉浸在“音乐美”的享受中。

(作者单位:连云港市海滨中学)

责任编辑 邱仕明

先民心声质朴情怀

——先秦古诗五首

鱼 禾

诗言志。先民们在劳动和生活中创作了大量的诗辞歌谣。至于先秦古诗,当推《诗经》《楚辞》两部瑰宝。一般认为,《诗经》为至圣孔子或乐师从黄河流域流传的 3000 多首古诗中删裁符合乐体的 305 篇而成。《楚辞》则为屈原及宋玉等楚地个人吸收民歌营养所创作。两部诗集分别是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伟大代表。至于没有收入两集的上古歌谣经过数千年历史长河的大浪淘沙,散见于《周易》《尚书》《礼记》《史记》等古文献中不过 200 余首,且大多经过整理或有错漏或因需要而改动,以至真伪难辨。但其历史、文学价值乃如沙海遗珠而不时熠熠闪光。今推介几首以飨读者。

其一,《弹歌》

断竹,
续竹;
飞土,
逐穴。(穴:肉的古字)

《弹歌》选自东汉赵晔所著《吴越春秋》,其成书虽晚,但所引这篇《弹歌》,从语言和内容分析应该是原始社会口头流传下来而经后人写定的,为中国最古老的诗作,没有之一。全诗只有八个字四行,选择四个场景如电影蒙太奇手法剪辑联结在一起,组成了从制作工具到狩猎的全过程,传神而生动。

石器时代制作狩猎工具应该说是一个相当艰难的劳动过程。电视片《荒野求生》作了一个测试,一位现代人用石刀石斧砍断一根竹子需要一个多小时。所以,“断竹”本身就给人充分的想象。其次是“续竹”。歌中没有交待怎样续,应该是石斧去枝、截断、破片,用火烤而做成弓形,用野藤、兽皮之类连

接两端成为弹弓,这些都省略了,总之是做成了,当然还达不到竹箭的水平,因为接下来使用的只是“飞土”。歌中打猎也是两步,第一步用弹弓弹出泥弹或小石块,目标或飞禽或走兽,全部以“穴”即肉来指代。第二步,一旦打中,便奔向受伤的禽兽,穷追不舍,直至猎获。

对于人类石器时代的狩猎活动,我们只能从考古和岩画中去探寻,至于具体的劳动捕猎过程则不得而知。而这篇《弹歌》用四个动词、四个场景,不自觉地运用切合现代文学艺术创作省略留白乃至蒙太奇手法给我们留下了充分的联想空间:在我们眼前再现了一群衣著兽皮的先民制作工具追捕猎食的完整画面,从断竹续竹时的期待到埋伏弹射追逐的辛劳与捷疾,从获取的喜悦到填饱肚子后的讲述歌唱,让我们感受到了先民情绪变化和生存的艰辛,可以说此篇是诗歌文字中的“活化石”。

其二,《伊耆氏蜡辞》

土返其宅,
水归其壑,
昆虫毋作,
草木归其泽!

不知经过多少年,先民从狩猎生活转移到以农业生产为生,在以石木作为生产工具的条件下,水、土、昆虫和野草是制约农业收成丰欠的关键因素。解决这些问题光靠劳作还不够,很多情况下要靠“天”。这里既有“天命”,又有农时。于是,古人在祭祀活动中又增加了这方面的内容。连云港锦屏山将军岩就是原始人类的祭祀场所,其中第一组岩画正是反映了农业与人类关系的图景。另一组的银河、



子午线及太阳星象图,证明了先民已经清楚地了解天气季节对农业的影响。

回到正题,本篇歌谣正是先民祭祀时的祝辞,既是祈求也是命令。与前篇诗歌相比,此篇更加丰满。虽然都为四句,但本篇诗作成功使用虚词调整节奏,可以配乐吟唱,应该能广为流传。所以为古籍更早地记载下来。

本篇出自《礼记·郊特牲》,是一个叫伊耆氏(有的认为是神农氏)的部落首领“腊祭”时的祝辞,“蜡(音 zhà)辞”即“腊辞”。直到上世纪靠天吃饭的自然经济一直是我国农业现状,所以很多地方依然保持“腊祭”之仪。

祝辞第一句希望“土”返回宅的原处。宅,就是居住的地方,指原地。全句的意思是祈求水土不要流失,蓄水、防水的堤坝牢固;保证农作有水土生长。

第二句从土到水,希望水归其“壑”。流到洼地即河流湖泊,不要任意地泛滥成灾。这也是千百年人们兴修水利的原动力。

第三句,昆虫,即螟、蝗害虫,“毋作”即不要兴起。虫灾对农作物是致命的,但其出现大面积虫害往往是在特定的天气条件下。一旦暴发,在没有化学药品的古代真是无力解决。所以先民希望昆虫不生。

第四句,草木归其泽,意思是各种稗草、野草不要在庄稼地里生长危害粮食作物,而返回生长它们的沼泽地带。给农作物除草一直是农业生产中最普通也是最费力的工作。在原始农业中,显得更加艰难。

诗歌可以让我们穿越到那个时代,跟他们逐句念诵,领略其庄严的仪式和发自内心的情怀。

其三,《击壤歌》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

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与上两篇集中反映人与自然关系不同,这篇反映的则是人与人的关系,具有政治意涵。诗作最早出于东汉王充的《论衡》,传说是尧帝时一位老人作“击壤”之戏时唱的歌。其《感虚篇》记载,尧帝时,有一位五十多岁的老汉在击壤唱歌,旁观者讲:“我们

的美好生活是因为尧帝的伟大德行。”老者回答:“吾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等力?”意思我自然作息,劳作饮食,跟帝尧有什么关系?帝尧出了什么力?后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据此附会,写成“帝力与我何有哉”,并流传至今。

虽然对《击壤歌》创作时间一直有疑问,但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却很高。清代以前一直视其为中国韵文之开山之作。近代多家中国文学史将其作为第一部诗作予以介绍。歌辞的内容通俗易懂,无须赘述,但其反映的治国思想却值得人们重视。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与自然这一主要矛盾让位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阶级社会就应运而生。人们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治理,或者说何种治理更有效,一直是智者们探求的课题。

中国以老子为先师的道家学者崇尚无为而治,认为最高的国家治理境界就是政府像天空、日月、大地般造福于民而让民众以为是自然形成,没有感觉。此篇就是民众受到尧帝的治理之功却根本不知,以为生活完全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与英国古典经济学始祖亚当·斯密认为政府是看门人、更夫的角色异曲同工。

今天,我们深化政府职能改革,提出简化创业手续,实施“负面清单”,即“法无禁止皆可为”,政府管理“法无授权不可为”,可以说正是这种治理模式的升级版。当然要达到让民众感觉不到治理的存在,不是让政府什么都不管,而是当管则管,不当管则不管。当管是消除一切反社会反市场经济,如坑蒙拐骗、囤积垄断、恶意阻碍流通的行为;不管则是减少一切导致权力寻租的非市场审批、干预行为,从而达到符合自然运行的现代依法治理模式。

其四,《卿云歌》

卿云烂兮,糺缦缦兮。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明明上天,烂然星陈。

日月光华,弘于一人。

日月有常,星辰有行。

四时从经,万姓允诚。

於予论乐,配天之灵。

迁于贤圣,莫不咸听。

鼗乎鼓之,轩乎舞之。



精华已竭，褰裳去之。

《卿云歌》始见于西汉伏生的《尚书大传》。其记载，舜在位十四年，行祭礼，钟石笙箎变声。乐未罢，疾风发屋，天大雷雨。舜帝沉首而笑，说天下不是一人的天下，钟石变声就是明兆。于是推荐禹接位，并与众臣相和而歌《卿云》。

全诗三章，第一章是舜帝领唱，歌词意思是卿云（即庆云，祥瑞之云）灿烂，如烟如云，萦回缭绕，预示着又一位圣贤将顺天承运受禅即位，圣人的光辉如同日月光华照耀，辉煌而又辉煌。

第二章是众大臣的唱和，他们赞美上天至明至尊，在灿烂群星中，将执掌万民大任再次赋予一位如同日月光华的至圣贤人。明着赞美上天，实则赞美舜的明察和德行。

第三章是舜帝的续歌。前四句是舜谦逊地说，日月星辰的运行、四季的变化都有其永恒不变的规律，人间让贤也必须遵循这种规律，才能使国家昌盛，万民诚信而幸福。中间四句叙述让位于贤圣的举动过程，奏乐，祝祷上苍，说明禅位既顺从天意，又符合民心，普天之下莫不欢欣。最后四句意思是正当人们击鼓鸣钟，载歌载舞，欢庆禹即位时，舜自感精华已竭，撩起下衣，悄然而去。如徐志摩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这样一个禅让的过程和舜帝的表白，让一位功成身退、不居功恋栈、荐贤自隐的政治人物的崇高境界和伟大胸怀充分体现。尤其最后“精华已竭”的自我评价及“褰裳去之”的潇洒之态。千百年来，异姓政权交接乃至同姓父子相传都相伴着血腥和阴谋。而尧舜禹的禅让体现出那样的崇高和纯洁，也许这只是传说。即使是传说，也让千百年来恋栈者汗颜，让我们钦佩和陶醉。

其五，《越人歌》：

今夕何夕兮寥洲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
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
心说君兮君不知。

《越人歌》我国古籍中第一首翻译作品，是一篇对越语原词的再创作。曾有学者对照原纪录据辞直译为：“今夕何夕，舟中何人兮？大人来自王室。蒙赏识邀请兮，当面致谢意。欲瞻仰何处访兮，欲待游何处觅。仆感恩在心兮，君焉能知悉。”和诗歌古译对

照发现，除第一句外都不是词对词、句对句的直译，而是对原诗意思的再创作，显得更加生动、活泼、传神而优美。前两句用“今夕何夕”，“今日何日”，设问追问，表现了强烈的感情色彩。尤其是最后两句，“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借“枝”与“知”的谐音双关的比兴手法，充分表达了仰慕者“粉丝”的深情，成为千古名句。

上面的直译对我们很多读者来说，还是难以理解，如果用现代汉语翻译，大意为：今晚是怎么样晚上啊，在河中荡舟漫游；今天是什么样的日子啊，能与王子同舟。深蒙您的错爱啊，不以我的鄙陋为耻；知道您是我尊敬的王子啊，我的心怦怦乱跳不停。山上生长着树木啊，树木长着枝；我的心中爱着您啊，您却不知。

相比其文字的优美，更有深意的是诗歌所反映的深刻思想内涵。本篇出自汉刘向编著的《说苑》。刘向在《说苑·善说》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大意思是春秋时襄成君始封之日，穿戴打扮很华丽，立于流水之上，陪同的县令呼“谁能渡王”。其中楚大夫庄辛很喜欢襄成君，说：“我能否牵着您的手渡河？”襄成君忿然作色而不言。于是庄辛讲了一个故事，说：“你没有听说鄂君子皙泛舟于河上的事吗？子皙乘舟，钟鼓之音结束时，船夫用越语唱了一首歌，用楚语翻译就是《越人歌》。子皙是楚王母亲的弟弟即亲舅舅，我难道不比越之船夫，把君之手，其不可为何？”襄成君于是拱手而进，说：“请原谅，自今以后，我愿以壮少之礼谨受命。”即以自己是年轻人对待长辈的礼节认真听他的话。故事套着故事，说的是一个道理，那就是人民盼望着人格平等，盼望着大家不分贵贱，统治者与下层人民能同甘共苦，互亲互爱。这也说明，作为领导者，不仅需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同时，形式上也要到人民中间，与人民打成一片。

五篇先秦古诗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集中反映了先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良治善政和贤者的赞美与期盼，是心中流淌的歌。

（作者单位：中共连云港市委党史工办）

责任编辑 张伟敏



莒国初都计斤城

孙 铭



周初莒都计斤城遗址

莒子建国

对于莒国初都的记载，莫有详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者。他在《水经注·淮水》中说：“游水左经琅琊计斤县故城之西。《地理志》曰：‘莒子始起于此，后徙莒，有盐官，故世谓之南莒也。游水又北迳赣榆县北，东侧有巨海。’”郦氏所云的游水是一条已经消失的淮水支流，它从淮水分出支流，历经涟水县、海州后流入今赣榆境内，依次流经汉祝其县故城（班庄镇古城村）、汉计斤县城（塔山镇土城村）、汉赣榆县故城（海头镇盐仓城村）、

纪鄆城（柘汪镇驻地东），游水从纪鄆城南入海。今赣榆区塔山镇驻地土城村南有一处土城遗址，当地人称其为土城。土城南去3公里为青口河，北有塔山，西北有夹山、徐山、子贡山为屏障。土城呈正方形，面积达2平方公里，四面城垣完好，墙基宽25米。东门南面因有小部分倒塌，从断面上看版筑夯土层次分明。夹棍眼排列整齐，上下间隔90~100厘米，左右间隔72到75厘米。夹棍眼本身直径12~15厘米。遗物中石英较多，并有极少量的弦纹

莒国，己姓，或云嬴姓、曹姓。据《世本》载：“己姓出自少昊”。莒当是东方夷人少昊后裔所立建立的国家。莒族兴起于羲、农之世，立国于三代，而始见《春秋》《左传》。周武王灭商以后，又封兹舆期于莒，大概是对降服于周的莒国进行重封以表示承认其合法地位。莒国初都于介根，或称计斤，其位置在今连云港市赣榆区塔山镇的土城村。西周初年，莒部落作为西周降服的小国，仍都计斤，春秋初年徙都于莒城，即今莒县驻地一带地域。

陶片。南京博物院考古专家来此考察发掘,认定土城为一处汉代古城址。根据郦氏《水经注》描述,此城位于今赣榆区中部,正是游水所经的西汉时期琅琊郡计斤县故城之所在。《汉书·地理志》记载:琅琊郡 51 县,其中有计斤。注云“莒子始于此,后徙莒,有盐官,世谓之南莒。”由此可见,汉计斤县建于莒城之旧地,土城既是汉计斤县故城,也是莒子初建之都——计斤(又名介根)城之所在。唐、虞时期的莒族是游栖于沂、泗、沭、潍、淄流域的巨族,繁衍众盛,为诸多部落方国所归宗。商代莒族聚居在鲁南及苏北的赣榆一带,故典籍有“南莒”之称。土城之南不远处有大莒城、小莒城两个村,据史学家考证是春秋莒国三都之一的渠丘之所在。

周初,受封者建国时,在地理位置方面都有所选择。《管子·乘马》篇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用水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莒国的初都计斤城(今塔山镇驻地土城)与春秋时期的渠丘(大莒城、小莒城),北有塔山,西北有夹山、徐山、子贡山,南临游水、小沙河(今青口河),既有大山作为屏障,又有河流保障水源,东面是一片辽阔的原野,使得莒城在“大山之下”“广川之上”的形势更加突出。

夏商、西周时期莒国的疆域因资料不足难以考定,根据《春秋左传》记载,莒国春秋时的疆域已相当可观。先看北面。《春秋·隐公二年》记:“纪子帛、莒子盟于密。”杜注:“密,莒邑。城阳淳于县东北有密乡。”据《清一统志》载:“密乡故城在昌邑县东南十五里。”莒县北疆可达昌邑县境。再看南面。《左传·昭公十九年》记:“齐高发帅师伐莒,莒子奔纪鄆。”杜注:“纪鄆,莒邑也。东海赣榆县东北有纪城。”又考《魏书·地形志》,南青州义塘郡之怀仁县有“莒城”。怀仁故城在今赣榆区西。《清一统志》亦云:“莒城在赣榆县西。”由此可见,今赣榆区东北和西面都曾是莒国的国土,莒国的南疆抵达赣榆区境。三看西面。《左传·成公九年》记楚伐莒“入郛”。同书昭公元年云:“季武子伐莒,取郛。”可知郛曾为莒国所有,其地历来被认为在今沂水县北。由上可证,莒国西境当在今沂水、沂南一线。四看东面。莒国东部在春秋前期基本上没有战争,春秋后期齐师攻入莒之纪鄆城,在今赣榆区东北的海港重镇柘

汪,故知莒国东境一定临海,今日日照市当在莒国版图之内。综上所述,估计莒国的疆域最大时南北最长处有 200 公里,东西最宽处也有 100 公里。

从考古文化上对应,莒地龙山文化大致与少昊时代相对应,岳石文化则相当于夏代。商代、西周至战国有关莒国的文献和考古文字资料,已经有了明确地记载。1959 年,南京博物院考古专家组,对赣榆的土城、下庙墩、苏青墩、青墩庙、大台子、后大塘、刘庄等七处遗址进行调查和试掘,发现了较为丰富的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遗存。这些古遗址不仅分布密集,而且大多从新石器时代文化经商周一直延续到汉文化。赣榆北与山东省接壤,以土城为中心的数处的龙山文化—岳石文化与山东境内莒县、莒南县、日照市的同一文化体系关系极为密切,表明两者之间具有同源性。因此,赣榆与鲁东南地区属于同一莒文化圈,莒地的龙山文化、岳石文化是少昊及夏商时代生活在鲁东南及苏北地区的夷人共同创造的文化。

商、周时期,国家形态日益成熟,今鲁南、苏北地域内出现众多小国,除了莒国以外,如纪国,故址位于今寿光市南纪台镇附近;薛国,其故址在今枣庄薛城区;鄆国,属于纪附庸国,其故址位于今泰安东平县东,向国,其古址位于今日日照市莒县南;郯国,其故址位于郯城县驻地附近。这些小国应有自己的中心城市,城市的文化辐射力主要在面积不大的国土范围内(有的小国的国土还不及现在的一县之地)。“土城”周围密集地分布着龙山、岳石及商周时代文化,充分显示该地在夏商周时期文化的兴旺发达,又“土城”之南不远处有“大莒城”“小莒城”两村作为地名“活化石”,我们有理由推测塔山镇土城村一带就是东夷莒国的发祥地。商、周时代莒国初都计斤,其故址位于塔山镇土城村。西周初年,武王伐商,及至成王时代,他们对包括莒国在内的东夷诸国,并非一味武力相加,而是采取安抚分封,“以夷制夷”的治国策略。作为东夷地区的莒国最高统治者兹舆期,臣服于周王,被封为子爵,史称莒子,莒国始立,仍都计斤。春秋时代,随着莒国实力的增强,莒地的扩大,其政治中心的都城必须向北迁至其国土中心区域,才能有效地统治全国,即从计斤“后徙莒”(今山东莒县一带),从此莒国的政治中心



始终保持在莒县一带,直至被大国吞并。

一度称雄

西周末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史称东周。从此周王室逐步走向衰落,失去了对诸侯列国的控制,进入春秋时代,诸侯争霸,天下大乱。齐国的齐桓公利用管仲为相,富国强兵,首先称霸,逐步并灭了周围诸多东夷小国,使齐国成为东方大国。鲁国也不甘示弱,连年对周边小国用兵。莒国跻身于众诸侯国之列,或盟或伐,争地保土,颇为活跃,上演了一幕幕文韬武略、时悲时喜的戏剧,创造了独特的历史文化。清代顾栋高曾引赵孟何之言曰:“莒虽小国,东夷之雄者,其为患不减荆、吴。自入春秋,未有入人国者,而莒入向。未有取人地者,而莒取杞牟娄,放恣无忌。”这段史料告诉我们:莒国是“东夷之雄”。春秋时期的东夷地区除齐鲁之外,小国也有十几个,能称“雄”者只有莒国。莒之表现在“入向”,即鲁隐公二年(公元前721年),莒伐向。《左传·鲁隐公二年》:“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归。夏,莒人入向,以姜氏还。”并乘机占领向国,使其成为莒邑。向是姜姓小国,为鲁国的附庸,地处莒国之南(今莒南县东北)。鲁隐公四年(公元前719年),莒人伐杞,取牟娄(今山东省诸城市西),使其成为莒邑。莒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敢于碰硬,长期与强大的鲁国争郛。莒国还招降纳叛,敢与大国抗衡。齐桓公为公子时,曾至莒国避难,留下了“勿忘在莒”的典故。公元前662年,鲁庄公死去,他有个名谓庆父的儿子权欲熏心,是个品行极坏的人。庆父连杀两个国君,谋求自立,因罪孽深重,遭到国人的声讨而仓惶逃至莒国,留下了“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成语。春秋时期,齐、鲁两国是东方的两个超级大国,一般的小国是不敢容留其叛国分子而自找麻烦的。上述齐、鲁两大国的贵族子弟虽然投奔莒国的具体原因不一,但他们以其为可以避难之地,显然与莒国的较强实力密不可分。

春秋中叶,莒国还有一段强盛时期。据《春秋左传》记载:鲁襄公四年(公元前569年),“邾人、莒人伐郕”;后二年,“莒人灭郕”。至襄公八年(公元前565年),“莒人伐我东鄙以疆郕田”;襄公十八年(公元前555年),莒犁公与鲁侯、宋公、卫侯、郑伯

等同围齐。综上所述,可见莒国在莒犁公时,又曾结交和联合周边国家灭郕、伐鲁、伐齐,在兼并战争中一度称雄。

逐步衰落

然而,莒国在春秋后期由于不断地发生内乱而逐步走向衰落。《春秋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莒纪公生太子仆,又生季佗,爱季佗而黜仆,且多行不礼于国。仆因国人以弑纪公。”造成国内大乱。《春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舆。既立展舆又废之。犁比公虐,国人患之。十一月,展舆因国人以攻莒子,弑之”,造成莒国再一次内乱。昭公十四年(公元前528年),莒著丘公卒,其弟庚舆与其子郊公因争立而互相攻杀,使莒国陷入第三次内乱。鲁昭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20年),莒国国君庚舆也因暴虐——喜好玩剑,铸剑杀人作试验,激起国人的愤恨,被围攻后而亡奔,使莒国发生第四次内乱。由于莒国内乱不休,国力不强,战备松懈,城池不修,楚国在鲁成公九年(公元前582年),连克渠丘、郛、莒“三都”。加之,莒政暴虐引起人民不满。昭公十九年(公元前523年),莒国一怀恨流落在外的寡妇(其夫被莒子所杀)帮助齐国军队攻入纪郕城。莒国在内外交困情况下,不断丧师失地,其国力日益削弱。

《战国策》云:“邾莒亡于齐。”《史记》则云:“楚简王元年(公元前431年)北伐灭莒。”莒究竟亡于楚或亡于齐,至今有争议,但从《战国策》已经把莒归为齐地看,莒的国土终归齐所吞并,应是不争的事实。

莒国的覆灭,有其自身暴虐的原因,但趋于统一的大环境才是决定其覆亡的主要因素。莒国作为一个东夷小国,能不畏强暴,自立于众多诸侯强国之间长达600余年,充分反映了莒人自强不息的精神。

(作者单位:赣榆区民政局)

责任编辑 于冰清



连云港市境内的望海楼

蔡立志

连云港市历史悠久，境内被称为望海楼的建筑物，大抵有十来处。可见望海楼这一称谓深受港城人的喜爱。闲来无事，笔者对市境内称之为“望海楼”的建筑物稍加分析，竟发现其有如下的特色。

特色一：望海楼并非全部是楼房

望海楼，这是一个具有诗情画意的名字，给人以美感，给人以愉悦，更给人以遐想。由于连云港人民喜欢望海楼这一名称，将马陵山上一座酷似海州鼓楼的象形山崖称之为望海楼。这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马陵山望海楼。

马陵山望海楼，是连云港市境内最西边的一座望海楼。它位于东海县桃林镇，与山东郯城县相邻。楼台坐落在海拔 184 米高的山上，离现在的海边 90 公里。这就奇了，这么远的地方能看到海吗？在地质年代的第三纪，马陵山还是个通海的断陷湖。20 世纪 80 年代地质队在马陵山上除发现了恐龙的一排脚印外，还在其旁边发现有一层小螃蟹和贝壳的化石，可见马陵山在海边是无疑的了。因此称其象形山崖为望海楼也在情理之中。

特色二：陆地海岛均建有望海楼

陆地上的望海楼是宋代建于海州城里最高点的上崖头处，此处坐落在老海州师范校园里。宋代诗人张翥在一首咏海州的诗里写道：“城外沧溟日

夜流，城南山直对城头，溪田雨足禾先熟，海树风高叶知秋。”直到清末海州城外还是“海水献波涛”，大波洪流尽收眼底。这座望海楼还被重修过，1938 年被日本飞机炸毁。

海岛的望海楼就是秦山岛上的望海楼。这座楼原是大庙，庙里供奉神像，闭目沉思，像是打瞌睡的样子，因此渔民称它叫“老海睡”，也不知它是哪路神仙。此庙坐落在秦山岛西头的海蚀积堤陆连坝的上方。由于地势较高，地处神路尽头，人们便称此望海楼为后大楼。

特色三：低处高处均有望海楼

海州城里的望海楼、秦山岛海里的望海楼、燕尾港镇上的望海楼、连岛上的阅海楼大酒店、黄窝庄上的观海楼旅馆，皆建于低处。

建于高处的有花果山最高处的海曙楼（又称望海楼、望日楼）、大吴山顶上的望海楼。花果山海曙楼也好，大吴山望海楼也好，均为观海观日处。“曙，拂日”，“当夫天鸡初喔，湛露方浓，东望扶桑，询天下之壮观也”。可谓“神仙今再到，仙境此中留”。花果山海曙楼不仅可观海中日出，还可面吻谷，俯瀛洲，望远岛，辨帆流，“海阔天空凭栏得，日升川至掌眸收”。正如《名山游访记》作者高鹤年所述：“前顶（花果山）的望海楼、泰山、崂山、天台山及南海诸山”，“亦未见此大观也”。



高山观日出,除大吴山、花果山两望海楼是极佳去处外,后顶大桅尖更是一个好去处。《名山游访记》作者高鹤年是一位佛教大居士,有“徐霞客第二”的称谓。他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寓居后顶悟正庵数月,曾上大桅尖观日。文中写道:“一闻山下鸡鸣,初见黑气渐白,海天一色。再海水渐红,金光灿烂,云水相连,变现霞光万道。日渐上升,如红车轮。回望西北,则见波涛之上各有红轮,千万波涛,千万红日,顷刻万端,可谓山海之奇观。”作者还记录了当年夏天于峰头静坐观日,看到了“蜃气幻成海市重楼、山水人物行动之状”的景象。这是后云台山关于海市蜃楼景象的最早记录。无比美妙的海景,无怪乎连云港人念念不忘望海楼。

特色四:屡圯屡修的海曙楼



海曙楼(现迎曙亭)

宋朝,东海县成为风靡全国的三元信仰诞生地。明成化元年(1465年)鲁府王孙度为僧,募资重建三官殿,改苍梧山为云台山,使三元大帝影响进一步扩大。山阳人谢淳爱其山水,于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决定毁家独资修建三元宫,一并修建海曙楼,又称望日楼、望海楼。至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大佛殿建成后皇太后及明神宗先后颁旨送经赠物给三元宫,明天启六年(1626年)熹宗朱由校题“敕赐护国三元宫”七个大字镌刻于三元宫山门之上,使三元宫成为“天下名山寺院”。清康熙七年(1668年)六月十七日郯城8.5级强震波及,海曙楼倒塌。康熙十九年(1680年)“复海”后重建三元宫,“海曙楼一新”。道光十二年(1832年)两江总督

陶澍重修海曙楼在金牛顶落成。道光十四年(1834年)陶澍倡捐重建海曙楼竣工,魏源应陶澍之邀,为其代作《海曙楼铭》刻于楼底东壁上。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沈云沛与苏州捐纳道台宋治基在南云台望海楼、围屏山、唐王洞等68处山坡上种植茶、桐、杉、樟1400多万株,创建云台山树艺公司,修复海曙楼作为办公处所。民国23年(1934年)杨虎城秘书长、“小萝卜头”父亲宋绮云随陕西各界赴连云港考察团来连考察,游览了玉女峰、望海楼、三元宫、水帘洞、大村塔等文物古迹,并出书向世人介绍。民国27年(1938年)5月,海曙楼被日军飞机炸毁。1986年10月,国家气象局选定原海曙楼旧址旁的金牛顶最高点安装一部大型714气象雷达,与沿海城市同类气象雷达联网。1987年11月10日,由于原址被714雷达占用,连云港市园林局便选择花果山最高点玉女峰东侧修建一座全国最大的全部为花岗岩结构的六角形“迎曙楼”落成,现俗称观日亭。

特色五:比肩而处的大小望海楼

1957年初冬,新海连市委书记许耀林在省里开会得知一个消息,即新海连市将有一项重要的接待任务。接待谁不知道,估计可能是毛主席。为了做好接待准备工作,当即采取一项应急措施:在新海连市还没有一座像样宾馆的情况下,决定从部队手中将北固山上的陈家小楼借过来,简单地装修一下以应急,然后在墟沟再建一座高级宾馆。

陈家小楼即陈调元小楼,又名雪轩别墅,位于北固山东南坡。陈调元(1886-1943)字雪轩,河北人。1923年任江苏淮海镇守使,1935年身为国民党军事参议院院长,陆军二级上将。陈调元与原“海州王”白宝山友好,往来甚密。在白宝山的建议下,于1936年在白宝山大楼的西上坡建陈小楼。白宝山大楼建于1924年,位于墟沟海滨公园内,人称白大楼。此楼由德国人设计并监造,三层,71间。陈小楼也为德国人设计,三层,计40间,由于比白大楼小,故称陈小楼。白大楼于1938年9月20日被日军燃烧弹击中烧毁,但陈小楼为全石结构的中欧



望海楼(陈调元小楼,现连云港警备区招待所)

古典式建筑,至今保存完好。位居 98 米的山坡上,居高临下,视野开阔,连岛及其前后海域尽收眼底,自该楼建成以后,虽叫陈小楼、雪轩别墅,但群众均称此楼为望海楼。

当许耀林书记把接待任务在市委传达后,市委常委会会议为何决定在墟沟建一座档次高一点的宾馆呢?这是因为当时新海连市的支柱产业盐业生产 1956、1957 年连续两年大丰收,市财政收入多收入了 600 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于是市委向当时的上级徐州地委打了报告。1958 年 3 月 10 日徐州地委书记刘锡庚来新海连市视察,对墟沟地区非常感兴趣,除同意建造新望海楼外,还提议新海连市委东迁。于是刘锡庚成了提出连云港“市委东迁”的第一人。1959 年大楼基本建成,但时逢三年困难时期,工程暂时下马,门窗没有上玻璃、室内没有装潢。1960 年省委第二书记刘顺元来新海连市视察,住在陈小楼,看了大望海楼的建筑以后,觉得不错,认为此建筑当属苏北地区最好的建筑,于是表扬了新海连市委。这时的市委书记田诚立即向省委打报告,省委同意拨款 8 万元,于 1961 年春将该楼装修完毕,此时新海连市已改为连云港市。

这座大楼建好后该叫什么名字呢?一时成为难题。1962 年春,华东局副书记魏文伯在新建筑内召开渔民座谈会,魏对此建筑无论是建筑位置、环境、气候等都特别喜欢,特地为此命名题字,为了区别

于小望海楼,魏题写了“观海楼”楼名。老百姓为了区别两座望海楼,便将陈小楼称为小望海楼,将后建的望海楼称为大望海楼。大望海楼建成后,先后接待过彭德怀、朱德、康克清、杨得志、杨成武等中央领导同志。

1972 年文革期间,驻连部队用西大岭部队营房、解放路原市政府大院的 283 大院、部队盐场招待所土地及建筑与市政府交换了大、小望海楼和原水产学校校址。如今的大望海楼为连云港警备区司令部所在地,小望海楼为连云港警备区招待所。

特色六:遍地开花望海楼

望海楼是沿海城市的独特风景线,所以在港城人民日常经济社会活动中多愿取名望海楼或与此词义相近的取名作为招牌。连岛旅游服务公司开办的餐饮公司取名阅海楼大酒店;黄窝村民张艳开办的旅游家庭酒店取名观海楼宾馆;东海县李埭林场御园旅游生态园的中心地带兴建了仿城楼建筑,其门楣上直书“望海楼”。在其装饰牌匾上就书写了 1300 年前盛唐时代诗人崔国辅在马陵山望海楼上观海的《羽山》诗内容:“因高见远境,尽此数州内。羽山数点清,海岸杂花碎。离离村木少,潏潏波潮大。日暮千里帆,南飞落天外……”站在此楼上遥望 10 多公里外的羽山、磨山,真可谓“数点清”。以此作为一处招徕顾客的景点,也算机巧无限。凡是去过的人记忆深刻,遥想 1300 年前的马陵山望海楼的景象,诗意绵长。

(作者单位:连云港市老科技工作者协会)

责任编辑 于冰清



海州二营巷的得名

宋继奎

海州城二营巷,南入口在中大街北侧,距离鼓楼很近;北入口原在新建路南侧,后因在巷口建大楼而拐向东,连通幸福南路。二营巷与向西依次排列的关庙巷、孔巷、隍庙巷、儒学巷一样,也是一条知名度颇高的古巷。

“文革”前,笔者曾在二营巷所在的新建街(今社区)工作几年,因此对它的自然环境、住户情况很熟悉,至今还能回想起一些印象深刻的人和事。前不久,听文友说到如今已被打造成文化休闲旅游地的二营巷,介绍其得名的文字表述有误。于是前往一探究竟。果不其然,巷内的墙上赫然写着:“因民国时期财政部税警总团二营曾驻扎于此而得名。”据查《连云港市志·军事·驻防》:“税警总团,民国20年(1931年)国民政府财政部以陆军四个步兵团为基础创建税警总团,共6个团,总部设在海州,近2万人。”如果说二营巷是因1931年税警团二营驻此而得名,距今只有80多年,那么它以前叫什么名字呢?文字介绍的撰写者想没想到这一点!

其实,二营巷自有了巷子就应该有了巷名。遗憾的是笔者在那儿工作时没有向老人们询问二营巷得名的缘由,因那时还没有研究地名的意识。直至2001年写《海州街巷名称索古》时,才试图先从古籍中查找。明代以前海州没留下地方志书。查明代《隆庆海州志》、清代《康熙海州志》和《嘉庆海州直隶州志》等,只记有街、坊,均无巷名的记载。后来在《海州史话·城乡名录》(张传藻、曹寿田编著,1987年12月出版)中查找到:“二营巷,原是旧军队水师二营驻地。”据此,在拙作中将其作为解释二营巷得名的“一说”;同时又联想到,海州是州治驻地,有不少衙门及相关机构、设施,有些地名就与之有联系,如三衙巷,是因邻近有海州署、州判署、吏

目署三座衙门而得名;大仓巷、小仓巷,是因邻近有常平仓和盐义仓而得名;隍庙巷、孔巷、儒学巷、大寺巷,是因分别邻近城隍庙、文庙、大寺而得名,等等,故从志书中查“营”,希冀找到答案。在《嘉庆海州直隶州志》中记有:“海州营……(顺治)四年定制,改明高内监宅为署,(官兵)坐镇州城,巡防赣、沭二县,兼辖东海营及沿海十三要口。”又“东海营:旧属海州营,雍正十年改设。”“驻扎海州东北地方,水陆兼防。”据此,笔者认为,这“二营巷”可能与清代的海州营、东海营有关,它虽然不像“三衙巷”等得名那样确指可信,但也一时找不出它得名的其他缘由。在它叫“二营巷”之前叫什么巷名,因无从稽考,姑且不论。因此,在拙作《海州街巷名称索古》中,将其作为二营巷得名的又“一说”(拙作见2001年7月11日《苍梧晚报》)。当然,文中并陈二“说”,意思是不作定论,还可继续探讨。但可以据此推测,二营巷的名称在清代就有。

那么,在税警团二营驻此之前的民国时期,这里是否叫作二营巷呢?答案是肯定的。据党史资料,陈鉴波自述他于1926年秋,与他人集资在二营巷开设东海书店,从事革命活动(陈于1930年加入中共,1937年进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后留在延安工作,1978年后任天津市政协委员)。如此说来,最迟在1926年这条巷子就叫作二营巷。因此,说1931年因税警团二营驻此而得名二营巷,是站不住脚的。

地名承载着地方历史文化的信息,它关乎到后人对地方历史文化的认知,解释地名不可不慎。

(作者单位:连云港市公安局)

责任编辑 于冰清



诗人杨廷镇

刘洪雨



后顶诗刻

“攀磴寻云壑，仙踪忆古初。
寺虚钟渺渺，海末日徐徐。
岛雾迷轻楫，旋烟灭旧墟。
何处闲事静，蓑笠狎耕渔。”

这是一首刻在悬崖上的五律，位置在云台山后顶北海观音寺遗址旁的峭壁上，作者是清朝康熙年

间的海州司训杨廷镇，时间是康熙三十三年四月（1649），距今已有三百余年。这首五律是杨廷镇与一众朋友游览北海观音寺遗址，在领略了该处独特的自然风光后，触景生情，诗兴大发，在其中一位朋友诗刻后的次韵作品。这位朋友的诗作写得十分优美，内容是这样的：

“云接扶叶近，微茫日上初。
烟光开北磊，山势似南徐。
绝壁凌空刹，残城拥废墟。
沧波千万叠，何处寄樵渔。”

后顶北海观音寺又名“大士禅院”“金佛禅寺”，曾香火鼎盛，与前顶三元宫交相辉映。清朝顺治十八年（1661），为防止前明复辟和倭寇的骚扰，曾实行过严厉的裁海政策，将沿海岛屿上的居民一律迁往内陆，云台山的庙宇也随之遭受了空前的破坏。直到康熙十七年（1678），才取消裁海令，称之为复海。18个春秋的风雨侵蚀使北海观音寺成为一片废墟。此情此景让杨廷镇等人在诗句中既感叹世事的变迁，又钟情于后顶独特的自然景观，同时还表达出对自由自在耕读渔樵生活的向往。

杨廷镇，字尔琮，号珉樵。清仪征籍，江都人。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中举，康熙三十年来海州任司训一职。所谓司训，又称训导，官为从八品，是协助学正负责县学管理与课业的官员。他任职海州司训共五年，曾在云台山的后顶和东磊共留下了8处石刻作品，除前面所说的五律外，在后顶的崖壁上还有“崩云”“气象万千”，东磊有“非人间”“海外壶



天”和作诗吟颂“玉女洗头盆”“神仙洞”“天台石”等题刻。古人在海州的崇山峻岭间留下了大量的石刻文字，而诗刻可说是凤毛麟角，杨廷镇之所以热衷于在崖石上题诗，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位著名诗人。



后顶“气象万千”崖刻

来海州之前，杨廷镇在扬州生活。自隋唐以来，扬州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在杨廷镇生活的康熙年间，一些诗人之间的大型集会唱和活动又重新活跃起来。康熙二十六年四月，戏曲作家、诗人孔尚任随工部侍郎孙在丰在扬州一带疏浚运河，在公务之余，孔尚任广结文人墨客，经常参与扬州的文人雅集活动。第二年三月，孔尚任又发起了扬州历史上著名的大型文人诗会活动——“红桥修禊”，共吸引了包括杨廷镇在内的24位名士参加，这次活动产生了大量的绝妙诗作。因为参与者的籍贯分别属于8个省，所以孔尚任称这次聚会为“八省之会”。

杨廷镇自从和孔尚任结识之后，二人之间的互

动交往相当频繁，大有惺惺相惜之感。杨廷镇在扬州有一个私人别墅，他将其命名为岷山堂，其中有水榭亭台，芳草奇花。人置身其中，可见曲径通幽，顿感幽雅别致，恍如世外桃源。孔尚任曾数度造访其间，并留诗相赠以赞：

“名园十里斗繁华，咫尺仙园闭在家。
转入亭中千曲路，不知篱外几重花。
新收雨气宜开卷，才买山僮解煮茶。
满眼沧桑无定事，好来闲住饭胡麻。”

另外，孔尚任还作了一首七律《题杨尔琮岷山堂》，用来描述杨廷镇当时的生活状态，诗曰：

“向平愿足早能闲，买得林泉似旧山。
一径直从苔上过，双门深在竹中关。
何人读史舒长啸，每日修仙驻好颜。
闻说桃源无洞口，亲曾两度看花还。”

康熙二十八年(1689)初夏，杨廷镇邀请众多诗友在扬州著名的文人聚会场所平山堂举办宴会，共有30人参加，其中不乏淮扬地区一些著名的学者名流，孔尚任欣然接受邀请，并即兴作了两首五律。杨廷镇与孔尚任之间的交往形式，印证了人们对杨廷镇“读书乐志，不妄交流俗人”的评价。杨廷镇的交往圈子里俱是些学者名流，人们将他与江都学者宗元鼎及诗画家蒋易合称为烟霞之侣。

杨廷镇在扬州期间的这段生活经历，为他的诗文创提供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平台，因此产生了大量优秀的诗文作品。他将自己一生所作的诗文汇集成册，分别名为《集鱣堂诗集》和《岷山堂诗集》。《江苏诗征》卷62收其诗3首。他任职海州期间在云台山留下的这些石刻作品，点缀了云台山、海、古、神、幽的旖旎风光，为今天的云台山增添了珍贵的人文景观。

(作者单位：连云港市汽车修理公司)

责任编辑 邱仕明

话说海州饼

韩世泳

海州的饼很有名。这不是随便说的。早在 960 多年前,海州的饼就叫响大宋王朝京都开封城。宋高宗绍兴十七年号幽兰居士的孟元老所著《东京梦华录》卷第四的《饼店》一文中,就有这样一段记述,说京城开封城内众多做饼的店铺,每天五更时便忙碌起来,揣面、剁剂、做饼震动案板之声“远近相闻”。而在这满京城的饼店中“唯武成王庙前海州张家、皇建院前郑家最盛,每家有五十余炉”。

这里说的明明白白是“海州张家”的饼店在京城是最负盛名,而且规模可观,有烤饼炉五十余个。

按照文中“每案用三五人擀剂卓花入炉”的记述,张家饼店用工达百人之多,店面是像个样子的。900 多年前的开封城是大宋王朝的国都,是大宋王朝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人口众多,经济繁荣。京城里的消费水平高自不用说,那些皇亲贵族、官宦富人家的消费要求更高。在这同行云集、要求又高的市场环境中,如果没有高人一筹的技巧,做不出千家万户喜爱的食品,一个来自东海之滨的打饼人想在京城站住脚,谈何容易,更不要说被誉为同行“最盛”了。可见,从我们海州去京城的张家,做饼手艺之高超,张家饼炉中出来的饼品质之精美、能适合京城千家万户口味是不容置疑的。

时至今日,这位“海州张家”家住海州何方?其后人中是否还有在海州继承祖业、传承这份非物质



古城海州

文化遗产的?谁也说不清了。但是,我们海州的制饼业从来没有间断过,而且确实很有特色。

海州自古是旱作物生长地区,以产“三麦”(小麦、大麦、元麦)为主;海州人也自古以面食为主,形成了喜欢吃面食的生活习俗。并且,经过祖祖辈辈的生活实践,不断创新制作方法,积累了丰富的制作面食的经验。

海州人制作面食,讲究很多:

从制作方法而言,大体分为四大类:一是蒸制品。蒸制而成的面食称“卷子”(馒头)、包子;二是炕制品。炕制而成的面食统称“饼”;三是油炸制品。如油饼、“果子”(油条)、馓子等;四是水煮制品。如水饺、面条、抹疙瘩等。在每一类制作方法中,又以多种操作技巧制成不同品类。



从制作原料上可分“死面饼”(未经发酵的)、“活面饼”(经过发酵的)和“饅面饼”(“活面”中参少许“死面”)。

从制成品的形状上可分为面饼、烤牌、锅盔饼、锅贴子、煎饼等。从制成品口感上可分为暄饼(因其大且厚,通称“大饼”)、杠饼、小脆饼、煎饼等。从制成品的花式品种上可分包子、夹子、麻花、花卷子等。从制成品的风味上还有甜的、咸的之分。

在人们的习惯称呼中,除了水煮面食和专炸馓子的店面外,一般都称之为“饼店”或“大饼店”。饼店中很多都是兼制多种面食品的。各个饼店在具体制作中又各有一精,以其特色引人、立足、发展。据有关资料记载,海州古城里东、西、南、北大街以及十字街头、马路口饼店很多,而以西大街潘家暄饼、十字街杨家的锅盔饼、西门外石狮口陈家的杠饼最有特色。如杨家的锅盔饼,制作精巧,形如头盔,里外焦黄如锅巴,而一口咬下是外脆内绵,越嚼越香。古镇板浦制饼业也很发达,而尤以陆家小脆饼独树一帜。小脆饼,顾名思义,特点“脆”。而陆家小脆饼是以祖传插酥手艺精制而成,炉中烤炙出的小饼一律5厘米见方、1厘米厚。小饼通身老黄而不焦,油光发亮。入口又脆又酥,满口生津,老少皆宜,远近闻名。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海州城里打饼的有好多家,都以打暄饼、杠饼、烤牌、蒸包子为主,兼炸油条。而以马路口南头、路西周玉顺家的大饼店较有影响。周玉顺个子不高,很胖,脸圆肚凸,有几分弥勒佛像,人们都喊他“周大胖子”。他有一手打饼好手艺,他家打饼,重在火候,锅膛里火头布派均匀(过去都用烧草锅),火头大小调控适时,先使饼剂迅速变熟,饼中遍布大小空隙,富有弹性;待饼涨起后及时翻转、旋转,稍后减弱火势,特别注意让平锅底均匀受热,锅内大饼炙烤均匀,饼面不糊不硬。因此,他家的暄饼外观利亮,内里绵软,剥开后剖面状如蜂窝;吃起来,又暄又香。如从中间扒开,夹进一根油条,那更是香甜可口,令人食欲大增。因此,很多人都喜欢到他家买大饼、油条,以大饼卷油条吃。

新浦成埠后,饮食业发展后来居上,饼店、饭店、菜馆、酒楼满街都是。其中,饼铺发展之快、数量之多尤为突出。因其经营者多来自海属地区,都身

怀一技,所制各式饼类,质量都属上乘。解放前夕,新浦城区(指今海州区的新浦街道之龙尾河以西地区及浦西街道一带)从事制饼业的饼铺达64家。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4年,新浦(区域范围同上)以制饼为主的店铺发展到137家。后来,经过合作化,私人饼铺合并为若干个合作饭店。加之很多原以做饼维持生计之人另行就业,新浦的专业饼铺数量大为减少。较长一段时期,吃早点难成为民生一大难题。

改革开放后,发展个体私营企业,允许外地个体商户前来经营餐饮业,海州区域内制饼业重又兴盛,饼之种类也随之增多。市民吃早点已很方便。但是,现在很多饼店,特别是工厂化生产的大饼、馒头批发企业,用发酵粉一类来让面发酵,这样发酵出来的活面蒸出的馒头、炕出的大饼,外形也不错,也很暄。但是,内在质量悬殊很大。这种馒头和传统的用“招引子”发酵,面糊起后揣上食碱蒸出的馒头、烙出的饼,吃起来口感大不相同。传统办法做的饼和馒头有嚼头,越嚼越香,满口生津。用发酵粉发面做出的饼和馒头,就没有原来那种口感,咬到嘴里没筋道,没嚼头,更谈不上满口生津、食欲大增了。打烤牌除发面工序外,制作过程也多粗放。烤牌、烤牌,重在一个“烤”字,饼贴到炉壁后,讲究用文火慢慢将饼烤熟、烤黄。烤牌出炉后面黄底白,外脆内绵。买回家放上半天,吃起来依然是脆的。现在不少做烤牌的是“急打火烧”,饼贴上炉壁几分钟就“好了”,不讲烤工,因此,也就应了“急火打不出好饼”这句海州俗话。烤牌出炉后很快就变软,稍放个把小时就更成老皮条了,失去了它应有的香脆的特色。现在又有些饼店打出了“纯碱馒头”之类的幌子,以示为传统技艺做的馒头。作为消费者,人人都想吃到传统办法做出的饼和馒头,人人都希望大饼、烤牌、馒头的生产者,特别是工厂化生产的大饼、馒头作坊,能研究、传承海州大饼、馒头传统制作技艺,让广大消费者重新吃到传统的海州饼。

(作者单位:海州区地方志办公室)

责任编辑 邱仕明



青口老街

葛永明

青口镇是赣榆区人民政府所在地，是全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史上曾是苏北鲁南著名的商业集散地。

青口地名来历，说法很多，较为可信的是：南北朝时（420—589），南朝刘宋明帝泰始三年（467），明帝在赣榆县地侨置在北方失去的青、冀二州，因该地濒海，利舟楫，便交通，是侨置的青州唯一的出海口，故称青口，距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虽然青口直至抗战胜利前都不是县治，但“享山川之饶，受渔盐之利”，一直是闻名遐迩的商贸中心。

青口商业的兴起，是有其特定历史、地理条件的。历史上，青口交通水陆两便，四通八达。最初，青口是海口名称。这个海口，水深港阔。向南，“由秦山东出鹰游门，顺流扬帆，收浏河口，与苏州相通”同时，华北、东北沿海南去商船，也多数在青口停泊。“奉天、山东，南来北往船只，皆须经由鹰游门内洋，横过青口。”史载，“吴、越、燕、齐之海泊，皆麇集于青口”。

青口这个海口，最早是个渔港。秦山周围是近海渔场主要作业区。青口与秦山一帆可至，生产作业，较他处便捷得多。因此，海口附近逐渐形成一个以渔民为主的居民聚落——这便是青口的早期村落。

海州湾沿岸发达的盐业生产也促进了青口商

业的发展。根据盐仓城、纪鄆城等古遗址历史考证，早在春秋初期，这里已经形成相当规模的盐业生产基地。

明嘉靖年间设置的兴庄场是淮北五大盐场之一。兴庄盐场的盐课司（盐务衙门）曾设在青口。《康熙赣榆县志》载：“兴庄岁办二万一千五百八十引”（“岁办”是明代赋役名称。“引”是计量单位。明代有大引、小引之分。大引四百斤，小引二百斤）。这就是说，国家每年向兴庄场征正税原盐约四百万吨。据此即可推算当时盐业生产是颇具规模的。

兴庄场生产的原盐，多数要经由青口运出。因此，青口又是盐商集中之地。当时，相适应的商业、服务性行业，也随之发展起来。这便是青口商业的雏形。

元明之交，青口河逐渐形成。青口河入海处与青口这个海口接通。由于青口河上游的沂蒙山脉带来大量泥沙在入海处淤积，乃使海岸不断向东延伸，青口这个海口与它附近的居民聚落也因之逐渐分离，这时，便出现两个青口：一指海口，一指居民聚落。清末民初绘制的地图，皆明晰地标明两个青口。

根据青口当地居民谱谍记载，明代万历年间以来，贸迁来此经商的外籍人，有山东、山西、安徽、浙江等省客帮。其中，周、黄、龙、许等徽籍盐商，都是



这一时期迁来的。柏、谢、赵等姓,都是明代青口富商。

清初禁海,“片帆不得入海”,青口商业一度受到遏制。清乾隆五年(1740),利用本县康熙朝进士倪长犀的学生,当时的江南制台张伯行的关系,上奏请撤海禁,以利渔商。皇帝下诏“题准”青口与浏河(今上海附近)对渡,可运豆去浏河。自此,因清初海禁而受到严重影响的青口商业迅速发展起来。各商号竞相派人到苏州等地,设立客庄(相当于现在的办事处)。外籍商人,也接踵而至。山西帮的油坊、当典、钱号;安徽帮的行号、酱园;江西人的药号;镇江人的丝烟店……都是这一时期兴办的。进出口商业,以花生、豆油、豆饼、崇明布为大宗。山东沂水、蒙阴、费县、临沂、郯城的饼、油、山货,泰安的麻,牛山、阿湖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来青口出售,然后购回洋货和南货。这就是常提到的,清代乾、嘉年间青口商业的繁荣。据当时统计资料记载:(青口)年出口生、豆油约在20万篓以上(每篓约200斤),豆饼18万担,腌猪5万头。高峰季节,青口日进生、豆油2000驮(一头牲口驮两篓油为一驮)。仅“周复兴”商号一家,日进油就有300车(每车400斤)。民国初年编印的地方史籍记载:“牛庄(今辽宁省营口市)出口的油销及全国,青口出口的油仅次于牛庄”,故有“北有牛庄,南有青口”之说,当时盛传:“如果开一条自山东通往青口的河道,那么山东的油,就能源源不断地流进青口。”

清末上海开港后,青口各号家在苏州设立的客庄,逐渐转移到上海。而外籍商人如浙江宁波,山东潍县、周村等地客帮,也纷纷来青口经商。青口出现一些较大的号商和新的行业,如专营进出口商务的船行报票行。有专门收购土特产的油行、饼行,专营洋货、南货的件子货店……此外如木材业、布业、渔业、百货业、酱园以及钱庄、坊店都迅速地发展起来。这一时期,青口还出现一些外籍商人组织的同乡会(兼同业工会性质)。有“宁波会馆”(即安澜公所)“山西会馆”“安徽会馆”等。用“交衢杂五方之人,哄市嗅千钧之鲍”这句话概括当时青口商业概

况,并非夸张。

清末政府腐败,国力衰竭,内外交困,太平军、捻军先后兴起,战乱不断,盗贼蜂起,四乡不靖。为保护青口工商业和居民安全,青口“豪首”、商会领袖周日森奉命倡筑圩墙,防捻防匪,历三月辛苦,日夜施工,建成青口城东西宽约890米,南北长约818米,周长4900米。城墙均高8米,建有东西南北四个大门和东南西三个小门,外有护城河,宽8米,深5米。

青口城建成后,寓和平安乐之意取名“和安圩”。和安圩的建成,为青口商业的发展与繁荣,创造了条件,保障了商民安居乐业,发展经济,避免了兵匪骚扰,青口商业再度繁荣。

和安圩建成后,曾对城区街道作了一次较大的调整,从南门至北门基本形成一条主轴线,这条主轴线南段称“盐市街”,北段称“耙头街”。沿轴线向东,至大东门称“前宫街”,原称磨盘街。向西至大西门,称“后宫街”,原称后大街。至小西门称“大街”,也叫“牌坊街”,至小南门称“二道街”,这几条街是当时青口圩内商业最繁华的街道,店铺密集,栉比鳞次,商号坊店,星罗棋布。人来客往,熙熙攘攘,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其时,在商会备案有字号的商家有240多家(没有字号的一般商店没有统计在内),单是商业经纪人,就有200多人(尚不包括没有正式“行贴”的“土行主”),这些商业经纪人凭丰富的商业经验和三寸不烂之舌,往来穿梭于各商号和客商之间,收取行佣,不用本钱就能赚钱。青口商业鼎盛时期,服务于商业的旅馆、饭店、客栈、坊店、水果店、糕果店就有130多家,许多饭店不但包办宴席,还上门服务,如同今日的外卖。其时青口有1748户,51957口人(1910年统计资料)。

综合史志界前辈李滌之、汪承恭、孙兴才等诸位老先生的回忆资料,抗日战争爆发前,青口主要商业行业和知名商铺有:

船行23家 船行经营性质,是代客买卖,收取行用。青口船行专门接待上海、青岛、宁波、盐城、威海等地庄客。把客户进口的洋货、南货经商业经纪



转售给件子货店,再代客购进饼、油、山货等土产。当时,县境内沿海有大、小商船 388 艘(不包括外帮商船)。青口有名的船户张聚兴拥有大、小商船 18 艘,蒋平善堂拥有商船 4 艘,程瑞林、庄文彦、孙东文、黄新友等共有商船近 40 艘。船行除代客买卖外,也自营进出口业务。朱乾太船行拥有资本 50 万元(银元),包括自己商船“走载”年纯利润可达 20 万余元。

号家 53 家 号家是自己经营进出口业务的行号,出口土产品,进口洋货。商业吞吐量相当大。青口商人崔彦章开的“恒吉大”,郑兰阶、宋汝庭合营的“严顺太”,宋楹祥开设的“仁盛”,黄韵松开设的“德聚乾”……各拥有资本 10 至 20 万元。大“号家”在外埠皆设有“客庄”,主持“客庄”的叫“庄客”。“庄客”除洽谈商务,还负责采购。到浙江收购扫把,到福建收购木材……小商号则委托大商号的“庄客”兼办,叫做“代庄”。另有一些季节性的,小规模的经营进出口业务“商号”,尚未统计在内。

油行 25 家 油行是收购生油、豆油的行栈。青口油行主要收购山东临沂、费县、沂水、蒙阴、莒县等地出产的生、豆油。油客运油到行,由行家过秤按价付款,不收“行用”,只收一定比例的“学积”(办教育的经费)。商业全盛时期的旺季,青口日进油 2000 驮。油行收的油,有的自己运销,多数则经油业经纪议价卖给号家。

饼行 3 家 饼行专门收购本县自产的豆饼。收购量相当大。每年约收 80 万片(每片 50 斤)。收购的豆饼经经纪卖给号家。青口经营豆饼的 3 家是“相盛记”“郑鼎太”和“张明记”。因为有利可图,当时的县知事王佐良在下口开设“恒萃”饼行,年收入上万元。

报票行 5 家 报票行的业务是专为商船“配载”,代客商办报关手续,收取手续费。如经手出口一篓油,收取 25 文钱的手续费。

酒行 4 家 青口 4 家酒行是酒经纪自己开设的。酒行收购本地自产的酒,也收购山东莒、沂、费、郯等地运来的酒。然后批售给店铺。当时,青口酒的

消费量之大是惊人的——日消费量平均在 400 篓左右。

件子货店 61 家 所谓“件子货店”,是一种成批购货,成件出售的商店。件子货店从行号那里成批购进洋货或南货,然后按件卖给外客。如糖按包,烧纸按块,扫把按捆……但不零售。当时青口有名的件子货店有保兴裕增瑞兴恒等。件子货店集中在当时的二道街一带。

鱼行 24 家 鱼行包括 18 家大鱼行和 6 家鲜鱼行。大鱼行分布在东西两大鱼市,较大的鱼行有“余生泰”“万盛恒”“张隆兴”等,资本皆在万元以上,并设有“渔业公会”。鱼行货源除本县自产之外,威海、宁波、盐城、燕尾港、潮河、东台、连岛、坊上、庙湖、斗龙港以及山东的登莱、石岛等地,皆有“庄客”常驻青口。

鲜鱼行 6 家 分布在小鱼市。鲜鱼行专门经营本口早晚两潮上来的鲜货,沿海渔民小筐、小篮的海货由行主以质论价,代客收付款,从中收取佣金。当时,青口的小鱼市全日经营,随时都能买到各种鲜货。

血料行 6 家 血料行收购猪血,零售给船户,作“血网”用。

木行 5 家 最早,木行经销上海、宁波客商从福建运到赣榆的木材,后来销售量逐渐增大,青口出现“协聚”“余生泰”“陈裕成”和“汪鸿泰”四大木行。他们都有自己的堆栈。开始,“汪鸿泰”资本微薄,仅河南岸有小木行一处。但其经营有方,陆续在青口四门外以及沙河、赣马、海头等地增设分行。自己用轮船到福建、广东采购原木,自购自销。其他三家无力竞争,先后倒闭。木行一业,遂由“汪鸿太”独家经营。

布庄、布店 21 家 山东潍县、周村和青岛的客帮,在青口设有布庄。青口人开设的布庄叫“同春”。零售布店有“梁松盛”“余聚茂”和“兴利”等,他们还兼营京货,一般还零售絮棉(自己加工零售)。布匹品类以崇明布为大宗,多销往山东。另外,有些山东布商,不设铺面,而是背着包,摇着大鼓走街串巷。



他们寄住客帮开设的布庄或布店里，不须纳税，较坐商灵活。

棉店 2 家 单独经营棉花，常年聘用技工，加工皮棉零售。

杂货店 32 家 杂货店以零售杂货为主，如酒、油、酱货、烟糖糕点等，糕点多是自己制造，资金不多，多系连家店。还有一些更小的杂货店，除经营上述货物，还零售粮食、蔬菜等，这类小店，面向贫苦市民。他们经营特点，突出在一个“零”字上。零售粮食最低限度为半“合”（读(gě)）四合一升，十升一斗。半合约重 0.37 市斤），根据要求，半合粮食也可以要 3 个品种——如大、小米和少许绿豆。一个铜板（面值 20 文）可买“三油”——酱油、虾油和麻油，一个“小板”（面值 10 文）可以买到放进少量韭菜花和麻油的辣椒酱。

酱园 13 家 酱园生产酱油、香醋、虾油以及各种酱货。大的酱园拥有酱缸 300 多口，一般的有 50—100 口。他们都有各自的零售店面，但主要批发。虾油、甜闷瓜为青口特产，名遐迩。

海货店 4 家 青口海货店多经营上海味，如鱼翅、鱼皮、海参、鲍鱼、鳔柱、虾米、鱼籽等。海味店还兼营海产品加工，如收购鲜虾加工虾米，腌制咸鱼等，至于“筛底”“毛螃蟹”一类粗货，也批售给小贩，运销山东的临沂、苍山一带。

猪行 5 家 猪行经营腌猪业务。秋冬之交，收购生猪宰杀腌制，腌猪多为盐城客帮经营，因此，腌猪也叫“帮猪”。青口当地号家也有自营出口的。“帮猪”远销上海，年出口量在 5 万头左右。

猪圈 5 家 猪圈的业务是临时寄养生猪，收取饲养费。猪客收购大批生猪，寄养圈内，等待售主。买主是猪行和当地屠户，屠户买好生猪，在圈内宰杀后上市。当时，正式登记的“肉案”是 33 家。青口猪肉消费量很大，年消费在 1 万头以上（不包括农民自养自宰的“临时肉案”）。

坊店 60 家 青口的坊店，实际是经纪行，主要收入是行用。客人进店，果品、生米、银花、槐米、苘麻、板烟等货物，皆经店家过秤出售，收取佣金。另

外，代客买货，还要收回扣，如一包海货回扣 5 斤。青口河南“魏国盛”“苗义盛”“张义盛”等 39 家坊店中，以“东元泰”最有名，老板叫张佃吉，据说他进南门一次，就有五只大宝收入（约 50 两银子），因为成交额相当大。成交一批，总是数千包。

旅馆 5 家 青口的 5 家旅馆叫“赢台”“青扬”“青河”“青新”和“长春”。各家皆有非常讲究的房间，有鸦片烟炕、赌场和称为“扬帮”的南方妓女。但收费昂贵，单房间日收费 10—20 银元。

糕点店 23 家 青口有名的糕点店（称糖果店）有“勤昌”“福顺”“同利祥”“裕和祥”。能生产粗细糕点近百种。其中“彩糕”为青口特产，远近驰名，一直是供不应求。特别是春节期间，外地客商多提前来青口订货。彩糕工艺水平很高。其薄如纸，切面彩色的“山水”“花卉”“万字”“八宝”等图案皆是“对丁”“青红丝”“五仁”、果脯等拼成的，十分精致，堪称茶点中珍品。另外，青口的绿豆糕、乌梅糕、交切、寸金、酥糖等，皆富有地方特色。

饭馆 32 家 当时青口包办筵席的馆子有 5 家。聚乐园饭店包办的烧烤全席光餐具就有一百零几件。青口烹调技术水平很高。外省饭庄挂牌“苏北大菜”的菜谱里就有不少是青口名菜。

随着胶济、陇海铁路的建成和青岛、连云港相继开港，青口的水陆交通优势逐渐失去，加之黄河夺道和沂沭河水不断淤积，青口港不断东延，下口至青口航道几近不能通航。青口商业随着交通优势的失去也日趋没落。外籍商人再次外迁，青口商人也多向上海、新浦、青岛发展。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飞机多次轰炸青口，日伪县政府盘踞青口达 7 年之久，横征暴敛，经济封锁，残酷盘剥，“清乡”“扫荡”，一度繁荣的青口商业终于辉煌不再。直至新中国成立后，青口作为赣榆县城，成为全县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商业贸易才逐渐恢复并迅速发展起来。

（作者单位：赣榆区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责任编辑 邱仕明



见证沧海桑田的龙洞庵

——九庵十八庙寻踪之三

孙大伟

龙洞庵坐落在孔望山南坡的一片平旷之上，掩映在古木森森、苍翠欲滴的绿树丛中。沿着山门前陡峭的石阶拾级而上，在山门前环目四顾，胸山前列，松排山面千重翠；山脚下大片果园，春华秋实，果满枝头万点红；东侧盐河波光潋滟，如蛟龙南去；西侧高岗苍翠满坡，松涛阵阵；回首庵后，孔望山百米危岩，松藤倒挂，仰之弥高。山门内两侧是钟鼓楼，中轴线北侧高高的台基上，是五开间的大雄宝殿，殿内正中法台上，供



龙洞庵大雄宝殿

奉的是佛主和阿傩、迦叶两侍者的塑像，还有一尊从缅甸引进的雕刻精美的玉佛，堪称镇庵之宝。大殿两厢是东西配殿，西配殿后是二层僧舍。整个建筑形成一个精致而紧凑的四合院。

龙洞庵始建于北齐武平二年(571年)，迄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是连云港市最古老的寺庙之一。龙洞庵原名龙兴寺，孔望山原名龙兴山，盖因山南有一名为龙洞的海蚀洞，传说有苍龙居其内，龙兴寺因山得名。龙兴寺建成不久，即因北周武帝在齐境灭佛，寺庙被毁。唐代，寺庙曾为海神庙。此后，

寺庙屡毁屡建，“龙兴寺”之名最后见诸文字记载是宋元符三年(1100年)的游龙兴山寺题名。龙兴寺于宋金末年废圮，至明代隆庆之前，是否重建，史籍无考。明代《隆庆海州志》和清代《康熙海州志》均无龙兴寺和龙洞庵的记述。清朝初年，有海州诗人为《龙洞庵》的诗作问世；清嘉庆年间出版的《嘉庆海州直隶州志》，有“龙兴寺……今为龙洞庵”的记述。据此推断，重建应在明末清初。重建时因紧邻声名远播的龙洞而更名为龙洞庵。

庵院虽然不大，但古遗存不少。大雄宝殿前，西



侧有一株唐人所植古柏，此树已是一千多年高龄。东侧有一株糯米茶，学名流苏，树龄也达 800 多年，春天采摘泡茶，清香怡人。院内东侧，有在山岩中掘成的一口古井，名曰“甘露泉”，井水清冽甘甜，为僧人饮用之水。有贵客来访，僧人用甘露泉水泡自制的糯米茶，清香解渴。井后侧是一片竹园。大殿西侧，有一股涓涓细流自大殿屋基下汨汨流出，这是当年修建寺庙时，导流寺后山间雨水所用，可见古人设计极为精巧周到。庵院前后两侧，还有不少两人合抱的古树名木。出庵门西行 300 余米，便是国内最早的东汉时期佛教摩崖造像，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山坡上还散落着东汉时期雕成的、国内最大的雕刻精美的重达 200 余吨的石象以及石蟾蜍完雕造像。庵西侧几步之遥就是著名的龙洞，洞周围的山间石壁上，现存有宋、明、清以来的石刻 30 余处，可见龙洞名气之大。其中著名的有明嘉靖年间海州知州王同所写的榜书大字“归云飞鸟”，还有他在重阳节与海州的文人雅士及社会贤达欢宴于龙洞前的一首六言诗的题刻，诗中“矗矗山岩曲抱，潺潺胸海东流”，证明那时的孔望山下仍是一片大海。龙洞庵背负青山，面临大海，掩映于苍松翠柏、茂林修竹之中，潮声、松涛声、古刹钟声伴奏于山光水色之间，既具诗情画意，又不失庄严穆肃，置身其间，如临仙境，一切俗务烦恼俱消。龙洞庵坐落于古迹众多、人文氛围浓厚、环境清幽的孔望山之阳，古往今来都是游览的好去处。

清代以前，孔望山仍呈半岛状，北、东、南三面是大海，山南侧有古海州港，停泊着南来北往的商船。时过境迁，昔日的海湾今天已是果满枝头，龙洞庵本身就是沧海桑田、文明发展的缩影。

龙洞庵自更名以来，大部分时间为首堂庙宇。20 世纪 50 年代，龙洞庵最后一任首堂住持守定法师曾先后任市人大代表和市政协委员。1959 年，守定法师病重，嘱海州三圣庵比丘尼能空继承他入庵主持佛事。守定圆寂后，能空偕师弟能了法师入住龙洞庵。能空和能了常住龙洞庵期间，以织席为生，朝暮诵经，勤于佛事。同时，利用庵内和自家的部分文物藏品，在西配殿和南殿办起了文物展览，展品中有《嘉庆海州直隶州志》，翁同龢、郑板桥等名家

的书画，《剑阁峥嵘图》《寒江雪钓图》等国内早期一函百幅珂罗版印刷名画，以及部分玉器、佛珠、法器。当时，市区展出文物的场所只有大慈寺内的市地志文物陈列室和龙洞庵两处。

文化大革命中，龙洞庵佛像被拉倒，文物被查抄，大殿和其他建筑均被拆毁，僧人被扫地出门，庵院内办起了农业中学。20 世纪 80 年代落实党的宗教政策，政府拨款按明代制式重建了大雄宝殿及其他配套建筑，新建了东院，庵院面积比原建制扩大，达 1500 多平方米。

1995 年，能空法师圆寂后，其弟子仁奉继任龙洞庵住持。仁奉法师，山东郓城人，1967 年生，高中毕业后于 1989 年在龙洞庵皈依佛门，拜能空为师，潜心向佛，持戒苦修。继任住持后，团结带领僧众庄严道场，弘扬佛法。鉴于龙洞庵形制狭小，建筑陈旧，难以开展较大的佛事活动和接待旅游团队，仁奉于 2015 年主持了龙洞庵重建工程。这次重建，采取大雄宝殿向后扩容和山门前移的方案，使庵院面积得到了较大增加。2016 年，大雄宝殿和左右配殿重建及新塑佛像工程竣工。天王殿和两侧法堂以及牌坊、碑亭等建筑工程预计 2017 年秋季竣工。整个重建工程投入将达到 1000 万元。

重建后的龙洞庵，以山下的牌坊为山门，山门内左右两侧是介绍龙洞庵历史的碑亭；沿牌坊中轴线北上，依次是高踞于 60 多级宽阔石阶上的一座三门天王殿，天王殿左右两侧分别是法堂和客堂；天王殿之后，宽阔的丹墀北侧，是高踞于汉白玉石栏后面高达 17 米的五开间大雄宝殿，内塑金碧辉煌、宝相庄严的三世佛造像，左右两侧是文殊菩萨和十八罗汉的造像；大殿两侧是两层的東西配殿，东侧是观音殿，楼上是藏经楼，西侧是地藏殿；东院仍为僧舍及生活起居场所。整个建筑群高踞在半山坡上，掩映在绿树丛中，雕梁飞檐，画栋流丹，层台耸翠，上出重霄，雄伟中透着庄严，清幽中含着神秘，尽显千年古寺的魅力。

(作者单位：海州区地方志办公室)

责任编辑 邱仕明

